DEMOCRATIC VISIONS

民主視野

NO.11
2015 AUTUMN
ISSN 2222-6826

2016大選風雲

學子捨身反課綱 甦醒的台灣魂

李登輝：台灣的典範轉移

解構2016的宋楚瑜

馬英九總統的執政回顧

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芻議

2016.1.16



《民主視野》數位版上架囉

李登輝民主協會與多家電子書店合作，推出數位網路版《民主視野》，從此不再受限於時間與地點，只要透過網際網路，就能免費閱讀與全本下載。豐富內容不打折，與紙本版同步上架，隨時隨地享受熱騰騰的知識饗宴，歡迎多多閱讀分享！

PC閱讀請搜尋

- Pubu飽讀電子書
- HyRead電子書店
- Hami書城

APP閱讀請下載

DEMOCRATIC VISIONS 民主視野

No.11 | 2015 AUTUMN

本期發刊 2015年9月21日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封面題字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發行人 張燦鍙

編輯委員 尤榮輝、李明峻、施正鋒、洪耀南、陸之駿、陳延輝、陳彥升、張信堂、許龍俊、楊憲村、劉坤鱧、劉敬文（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總編輯 許龍俊

執行主編 劉敬文

助理編輯 黃裕翔

美術編輯 及思有限公司

電話 02-2808-0595

傳真 02-2808-0596

電子信箱 leedemocracy@gmail.com

網址 http://www.lthsociety.org

地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1號30樓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理事長 張燦鍙

理事 李雪峰（常務）、許龍俊（常務）、王壽國、尤榮輝、李明峻、施正鋒、陳彥升、張信堂、高基讚、許淑晴（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監事 許主峯（常務）、陳延輝、施慈航

策略執行長 劉敬文

ISSN 2222-6826

國內訂閱 每期150元，全年4期500元

捐款贊助帳號

台灣銀行（代碼004）群賢分行

帳號 16200-10054-64

戶名 李登輝民主協會

郵政劃撥

帳號 50153732

戶名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ntents

4 編輯室報告—新時代台灣人的未來 就看2016大選！ ◎劉敬文

民主視野

6 台灣的典範轉移 ◎李登輝

13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李登輝

2016大選

20 解構2016的宋楚瑜 ◎洪耀南

24 親民黨總是在關鍵時刻—替國民黨抵擋台灣轉型正義最後一哩路 ◎許龍俊

26 馬英九總統的執政回顧 ◎編輯部

分配正義

32 左右搖擺的蔡英文 ◎周偉航

課綱違調

36 先學會成為人，再學會當學生 ◎黃靖茹

40 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鄭麗君

44 課綱微調爭議與民主公民教育 ◎林佳範

憲改檢討

48 憲改就這樣玩完了嗎？ ◎羅承宗

52 點燃全面憲改的新火 ◎徐偉群

國際戰略

57 中國經濟的兩個盲點與兩個陷阱 ◎張清溪

62 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芻議 ◎邱義仁

透視歷史

74 由歷史經驗看國家與社會的解構（中） ◎廖亮和

92 會務紀要 ◎秘書處

新時代台灣人的未來就看2016大選！

劉敬文

2016年總統與立委大選即將於明年1月16日舉行，一般認為影響未來甚鉅，台灣能否擺脫馬英九執政八年極度無能，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所留下的各種爛攤子，走向成長、均富的方向，同時鞏固台灣的民主、自由與法治，就看此一選舉。

雖然此次總統選舉的登記日尚未到來，但基本格局應以不會有太多變化，應是三強搶一的局面。親民黨宋楚瑜在國民黨令人跌破眼鏡確定提名洪秀柱代表參選總統後，宣布參選，寫下台灣選舉史上難以超越的記錄。爾後，恐怕很難有人能如宋楚瑜這般，有四次參選總統這樣輝煌的記錄。

誠如總編輯許龍俊在〈親民黨總是在關鍵時刻〉一文中提到的，從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角度看，本來其實並沒有「藍綠問題」，只有「藍」（國民黨）與「非藍」（黨外及民進黨）的對抗。「藍綠」是從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後，為混淆焦點所創出的新詞彙。而宋楚瑜作為國民黨戒嚴時期媒體控制的關鍵人物，其所代表的反民主、反平等、反自由價值，恐怕很難藉由一抹泥巴就掩蓋，相信一起走過那個年代，或對那個年代有清楚認識的人，都不會在選舉操作下輕易被誤導。

台灣的未來取決於人民在明年1月做的選擇，此一選擇，也將牽動國際關係與情勢。李登輝前總統於今年七月赴日本國會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進行演講，相當受到日方禮遇，演講十分成功。此行在國內也引發許多話題，李前總統從個人經驗回憶日本時代台灣的相關談話，讓包括馬英九、洪秀柱在內受國民黨史觀影響的藍營人士做了倉促且斷章取義的批判，彷彿是害怕李前總統講的史實一旦揭露，他們慶祝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神話將就此破滅一般。

其實，國民黨史觀的擁護者實在無須多慮。這幾年，有越來越多年輕一輩開始覺醒，許多史實透過網路廣泛散佈。國民黨在戒嚴時代打造的種種神話，早就已經破滅。

李前總統赴日演講，引述魯迅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馬英九等國民黨人士，實在應該引以為戒。

除了對中國民族性提出批判，李前總統談對台灣未來的展望時亦進一步提到「脫古改新」，勉勵台灣人應該拋棄中國古代所留下的習性包袱，朝著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概念、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轉換的方向努力。李前總統這樣的期待，其實已經在太陽花運動以及反課綱運動中看到回應與未來的希望。馬政府一意孤行推動「返古」課綱，與李前總統提的「脫古」方向完全違逆，也因此激怒新生代高中生。解嚴後出生的他們，不願所生所長的土地上再有威權政府透過教育扭曲歷史與是非，對人民進行洗腦，所以計畫佔領教育部，進行激烈的抗爭，不畏之後各種可能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清算或司法追訴，用行動體現了「新時代台灣人」的精神。本期《民主視野》因此邀請長期關心台灣教育的立委鄭麗君，以及師大林佳範教授，針對反課綱議題撰文，進行深入探討。

台灣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憲法，然而，在國民黨掌握國會多數的情況下，好不容易透露一絲曙光的憲改行動，結果仍終告失敗，各界譴責聲四起。參與此次憲改行動甚深的南台科大教授羅承宗〈憲改就這樣玩完了嗎？！〉一文，清楚說明此次憲改原委，並點出憲改要能成功，「唯有促使信仰台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進步力量在立法院席次極大化，主客場逆轉，2018年憲改契機才會真正到來。」中原大學徐偉群教授所撰之〈點燃全面憲改的新火〉也呼應此一論點，主張「2016的新政治，就是再一次打造憲政時刻的契機。」

《民主視野》冬季刊預計12月發刊，時屆2016總統與立委大選最為白熱化之際，本刊將邀請最專業的學者、意見領袖，為您剖析大選選情及其他重大公共議題；同時，也將以更大的格局，預視選後的台灣，在前瞻性思維的引領下，提供宏觀且具縱深的全方位資訊，以回饋讀者的支持。

敬請期待！

台灣的典範轉移

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李登輝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脫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



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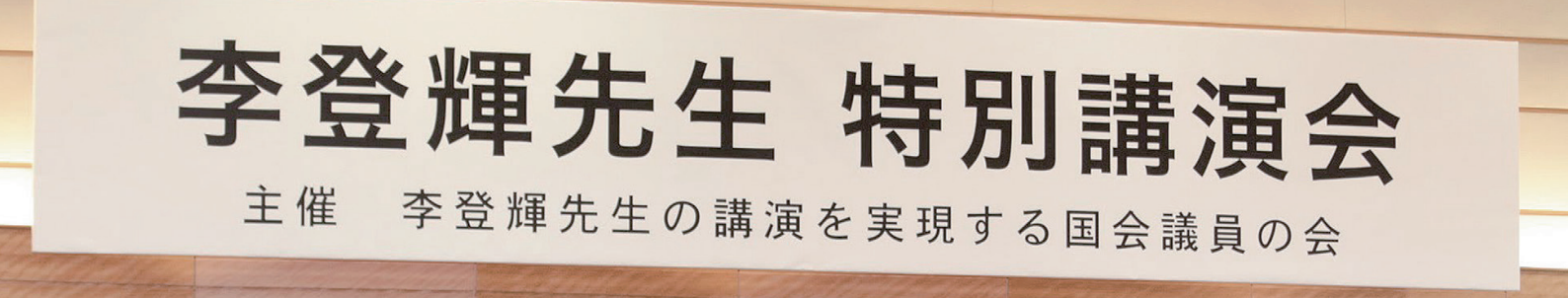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



魯迅描述中國封閉的帝王政體：「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



台灣打開民主大門後，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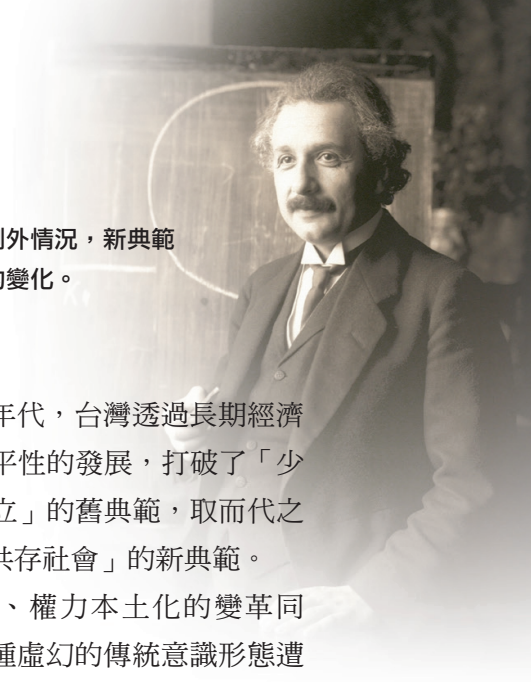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



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



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〇年代後期到九〇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〇〇〇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



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本文為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2015年7月22日蒞臨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演講參考稿）

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李登輝



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副會長彼得・蘭根（Peter Langan）先生，以及齊聚會場的各位記者先進，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這次受邀到國會演講，昨天有機會向許多國會議員發表談話。

再來就是今天，這是二ＯＯ七年六月以來，時隔八年再次造訪，能二度獲得演講的機會，實在深感榮幸。

八年前，參訪殷盼多年的奧之細道，猶記旅行最後一天，就在這裡發表演說。當時坐在身旁的中嶋嶺雄教授，如今已成故人，不禁感慨歲月無情。

另外，中國八年來經濟發展順利，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與日俱增，擴張領土的野心也愈趨明顯。這種現象，與主導世界政治走向的美國弱化發言權，應該不無關係。

過去是美國和日本等先進五國，所謂的G5在決定世界經濟和政治走向，後來先進國家的力量同步衰落，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轉趨強勁。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但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換言之，欠缺發揮主導功能的國家，可說正是國際秩序的崩毀。美國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就把它稱為「G零」的世界。讓我來說，就是戰國時代的來臨。

面對這種混沌時代，經常盤桓在我腦海的是，我們台灣的未來。所以，今天就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為題，向各位談談我的想法。



近年來國際秩序走向多樣化，能取代美國，承擔統御全球能力並擁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或組織，已經不存在了。

台灣是移民組成的社會，信史以前，原住民已居住在台灣的平原和山地；從對岸福建等地渡海來台的人，被稱為漢人、客家人，戰後從中國大陸東渡的主要是外省人。另外，四百年來有六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清朝時代台灣被視為「化外之地」，曾經長期未納入版圖。

一八九五年，日清兩國在馬關召開和談會議，談到割讓台灣的問題，清國代表李鴻章對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難治，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乃大清治權未及的化外之地。」

對此，伊藤博文說：「日本願接納台灣」，從而接受割讓。如其所言，後來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完成了前近代農業社會轉型為近代化社會的改變。

只是，台灣到現在還是移民社會。因為如此，我擔任總統時認為，既然帶領這樣的移民社會，就一定要設法化解族群對立的問題。

如果像過去那樣，台灣人內部自己區分本省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就不可能建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我當時覺得，一定要讓台

灣這個祖先生息之地撤除不同族群的藩籬，引領台灣擘建為新國家。

一九九四年春天，當時我還是總統，這已經是超過二十年的往事了。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完成《台灣紀行》的創作後再度訪台。他遵守前一年見面時約定「明年四月再度來台」的承諾，前來拜會本人。

當時我和內人談到要和司馬先生談什麼好？內人說「不妨談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台灣人擁有超過四百年的歷史，生為台灣人卻無法為自己的國家奉獻，確實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為台灣付出，對台灣產生的感情是無法改變的。

同時，我對台灣人長期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悲慘命運，感到非常憤慨。內心總是自我期許，有朝一日，希望能為台灣建立主體性，並提昇台灣人的尊嚴。

後來有機會參與政府工作，甚至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還要把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接著要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目標。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落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

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來了國民黨政權，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在這種狀況下，台灣人便湧現「新時代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還是以二等公民來對待台灣人。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當時台灣人站在兩個外來政權之間的邊緣線上，對於我的自我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狀況，顯示台灣人意識到自己是處於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兩種生命形



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

式、兩種世界、兩種時代的邊緣人。

幾年前，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時代台灣人》這本書寫道：「完成民主改革，蛻變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不應走回民族國家的老路。」一定要從虛幻的大中華思想中跳脫出來。台灣國民的共同意識應該是民主，而非民族。因此，本人倡導的「新時代台灣人」，就是統稱民主社會中擁有公民意識的國民。

新時代台灣人，絕不是以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形成台灣民族的主體，而是基於一視同仁的觀點，把所有人都視為平等的公民。

新時代生活在台灣的二千三百萬人，應致力於精神改革，擁有新意識，還要實現主體思想的變革。

透過「新時代台灣人」的自我意識，才可能確立「自己是誰？台灣人是誰？」的自我認同。自己透過「一個人的獨立，就是台灣人」的絕對認識，過去的自己就能獲救。

以新思維來否定過去，建設新未來。其結果，可以深化民主，進一步打造出新而民主、自由的台灣。

接下來，我想談談「中國的託古改制」。「託古改制」是「參照舊制進行改革」，這種思考重視舊制度的承襲。

打開中國歷史，黃帝之後的夏、商、周，以至明、清，都是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這個體系被認為是「中國的法統」。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所以中國人的特色，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範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絕對沒錯。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

從毛澤東開始，以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表面看起來是「共產黨」，其實就統治策略來看，共產黨早已中國化。就連中國收回香港的「一國兩制」，也是中國固有的產物，並不是鄧小平所發明。

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今年三月，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世。由於同年，所以我們常常被拿來援引比較，我想說明的是，李光耀和我的思想完全不同。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他的評論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而是另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著有《文明衝突論》的杭亭頓教授寫道：「李登輝死後，台灣將留下民主，但李光耀死後，制度隨之而去。」



李光耀採行的是亞洲價值的同族主宰體制，我推動的則是尊重民主自由的世界價值。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在此，本人想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新方向。「脫古改新」是擺脫舊體制，重新改弦更張，也就是甩開亞洲價值之意。

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潮流所接受。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的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台灣要「脫古改新」，必須分別處理台灣本身的問題，以及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

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透過六次修憲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達成主要修憲目標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央民意代表全部由台灣人民選舉、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總統等，陸續完成改革工作。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

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到了一九九九年，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更明白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明確劃分界線。我們可以這樣講，超過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麻煩都是來自中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能夠釐清，台灣就可以長治久安了。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

台灣要建立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國家，文化建設很重要。因此，我在政治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教育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心靈改革，以期減少「一個中國」的文化色彩，由多面向建立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文化，從而堅固台灣的國家根基，當時我把它稱為建立「新中原文化」。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新文化的建立，以及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由「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今天就跟各位談談「建立台灣主體性之道」，承蒙各位聆聽，謝謝大家！

（本文為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2015年7月23日蒞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演講參考稿）

解構2016的宋楚瑜



洪耀南

宋楚瑜參選總統確定，是泛藍分裂局面再現？還是一統泛藍的機會呢？雖然棄保話題提早上場，但宋楚瑜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宋楚瑜的政治精算打著是什麼算盤？

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正式宣布參選第十三屆總統，繼民進黨蔡英文與國民黨洪秀柱之後，成為第三位具備法定參選資格的候選人。自2015年初以來，宋楚瑜參選總統的風聲不斷；在國民黨總統初選期間更傳出，若提名洪秀柱則宋楚瑜一定會參選的消息。經國民黨719全代會確定提名洪秀柱為總統候選人後，至今與蔡英文民調呈現有一段距離的落差，加上當選看好度更是懸殊，這中間的落差導致有宋楚瑜宣布參選的空間。宋楚瑜參選總統確定，直到正式宣布參選，是泛藍分裂局面再現？還是一統泛藍的機會呢？雖然棄保話題提早上場，但宋楚瑜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宋楚瑜的政治精算打著是什麼算盤？

宋楚瑜的個人形象鮮明，雖被歸類為泛藍，但他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恩怨情仇卻是眾所皆知。自李登輝卡宋凍省、2000年總統選舉的興票案、2004年連宋競選經費爭議、2008年國親成功聯盟、2011年傳聞馬英九非常不喜歡宋楚瑜和2012年參選總統等。今日宋楚瑜決定三度參選總統，他身上的中國國民黨標籤已接近洗白，在2014年接受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市府顧問邀請後，宋楚瑜的身分從過去的「宋省長」更新為網路鄉民所封的「宋神掌」。

自2007年國親合作，親民黨將黨內從政黨員送回國民黨後，卻卡宋無法重返國民黨更無能力結束親民黨，導致親民黨勢力逐漸式微。2012年因國民黨執政不力，宋楚瑜再





宋楚瑜的個人形象鮮明，雖被歸類為泛藍，但他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恩怨情仇卻是眾所皆知。

度角逐總統並順勢拉抬親民黨，在立委選舉通過5%門檻，獲得二席不分區席次及一席原住民立委共三席。但2013年親民黨原住民立委林正二因賄選判決定讞被解除立委資格，黨團缺一席，面臨解散，宋楚瑜無力拉回已回鍋國民黨的子弟兵，甚至國民黨不願意出借一席委員，導致親民黨黨團被註銷。2012年陳萬水癌逝，讓宋楚瑜退居幕後，當時許多知情人士亦指出宋楚瑜可能不會再次參選。2014年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大敗，宋楚瑜在選舉前後都公開對國民黨執政表達不滿，擁宋再次參選總統的呼聲不斷，但宋楚瑜遲遲未下決斷。直至國民黨確定提名洪秀柱，泛藍在看似選情無望的態勢下，終於逼出宋楚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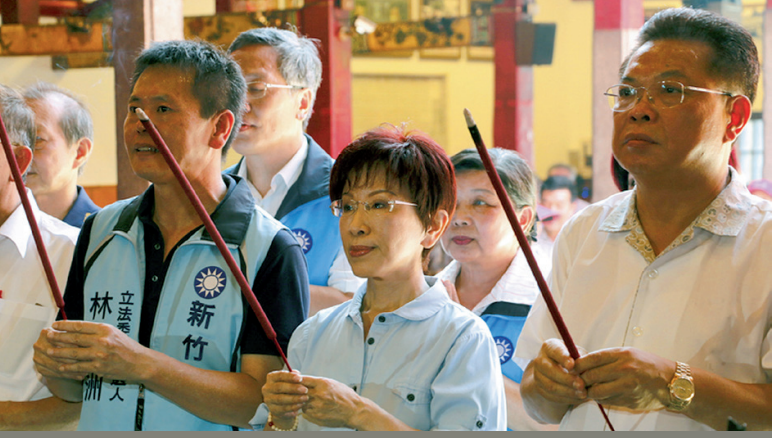
在參與三次總統選舉和臺北市長選舉失利後，宋楚瑜以「跨出這一步、一起找出路」作為此次參選的宣言，並提出「化解對立」、「推動修憲」、「總統至立法院作國情諮文報告」、「組織聯合政府」、「關懷民生」及「兩岸和平發展」等六項承諾。關於眾所矚目的兩岸政策主張，宋楚瑜直道兩岸已經是兩個治權，而台灣內部的最大共識即維持中華民國現狀、避免兩岸黑箱作業和堅持民主自由；他主張改變兩岸現狀必須尊重台灣2300萬民眾的自由意志，且台灣有權參加非政治性的國際及區域組織。宋楚瑜並多次強調若選上總統將不分黨派廣納人才，積極促進台灣政治的和解與包容。

從宋楚瑜參選宣言中，突顯聯合政府讓外解讀宋楚瑜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參選總統主要是衝高國會中親民黨的席次，另外是主打兩岸和平牌，在組織面企圖挑起國民黨派系的倒戈氛圍。所有評論對宋楚瑜參選後效應出現二級化的看法，甚至棄保話題提早上場。但目前解讀宋楚瑜現象卻出現有四個誤區，首先宋楚瑜有所謂兩岸因素的優勢、其次國民黨地方派系跳船是為投靠宋楚瑜、三宋楚瑜參選是為拉抬親民黨政黨票，四是泛藍會棄洪保宋。但事實如此嗎？其實不然。

首先要清楚知道國民黨的選民結構，大致可以區分四個塊，外省族群、軍公教及眷屬、地方派系、經濟選民。但此四個選民結構在馬英九執政下彼此之間充滿矛盾，馬英九在年金改革與分配正義上得罪軍公教族群與經濟選民，在認同上地方派系與外省族群產生落差與衝突，在國民黨改革中只消滅地方派系引發地方派系不滿，國民黨選票結構上的矛盾是宋楚瑜大展身手的切入點。



宋楚瑜參選宣言中，突顯聯合政府讓外解讀宋楚瑜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參選總統主要是衝高國會中親民黨的席次。



雖然宋楚瑜立場是兩岸一中，但中國如果表態支持宋楚瑜，明顯加速讓洪秀柱崩盤，恐怕是中國所無法接受。

兩岸因素真的是宋楚瑜的優勢嗎？

宋楚瑜在正式宣布參選前，媒體大動作報導宋楚瑜將出席中國舉行九三閱兵，企圖營造宋習會的氛圍。參選聲明正突顯宋楚瑜最熟悉美、日、中，意圖在對洪秀柱兩岸議題的暴衝，對蔡英文的兩岸議題不放心，爭取選民的認同與中國的背書。中國國台辦立刻打臉宋楚瑜，甚至對台研究機構接受台灣媒體訪問口徑一致，批判宋楚瑜是攪局者。

北京會拋棄國民黨？會切割支持一中同表的洪秀柱？答案非常明顯，雖然宋楚瑜立場是兩岸一中，但中國如果表態或營造支持宋楚瑜，明顯就是加速讓洪秀柱崩盤，如果洪秀柱得票率太難看及離譜，將被解讀一中同表在台灣不被接受，恐怕是中國所無法接受，所以兩岸議題就不會是宋楚瑜的優勢。中國國台辦甚至大動作宣稱不介入台灣大選為藉口，間接拒絕宋楚瑜登陸，關閉宋楚瑜操作兩岸議題的空間。

地方派系的跳船是為投靠宋楚瑜嗎？

宋楚瑜參選之後，李鴻鈞宣布退選不退黨、接著張榮味也替張嘉郡宣布退選不退黨，加上之前鄭汝芬退出國民黨提名立委。親民黨更暗示未來還有多位國民黨立委將跳船，似乎跳船者都是為了支持宋楚瑜，真的是如此嗎？

在2000年之前宋楚瑜氣勢如日當中，省長全省跑透透，與地方派系緊密結合，當年更有能力與實力吸引地方派系倒戈，但事實不然，在2000年大選派系明顯地方例如台中縣只能38.1%、在雲林縣也只有27.7%、在嘉義縣更只有26.98%。當年派系都沒有倒戈，如今的宋楚瑜氣勢更不如當年，更沒有資源，這些地方派系更沒有理由會倒戈支持親民黨。地方派系會棄選會跳船，主要在大環境與國民黨內鬥，加上提名洪秀柱導致地方派系勝選機率低的原因，並非因要支持宋楚瑜導致跳船。

宋楚瑜參選是為親民黨政黨票嗎？

宋楚瑜等於親民黨，親民黨等於宋楚瑜，但政黨形象需要長期經營，雖然宋楚瑜能吸引中間選民或泛藍選民，並不代表這些選民因為選宋楚瑜也等於支持親民黨。宋楚瑜如果在總統大選得票率高，恐怕政黨票會出現補償國民黨的效應，除非宋楚瑜最終是被棄保，政黨票會出現補償宋楚瑜效應而增加（如2012年選總統與親民黨不分區得票差異，最明顯如雙傅，花蓮傅崑萁、苗栗傅學鵬，棄宋補償政黨票，在苗栗縣親民黨拿下11.09%政黨票，宋楚瑜只拿到2.97%，在花蓮縣親民黨政黨票7.83%，宋楚瑜也只拿下3.76%，宋楚瑜最核心的子弟兵劉文雄的地盤，親民黨也有8.01%，宋楚瑜也只拿3.94%）。近期內所有民調都顯示，國民黨



地方派系會跳船，主要在大環境與國民黨內鬥，加上提名洪秀柱導致地方派系勝選機率降低，並非因為支持宋楚瑜所導致。

提名洪秀柱支持度遠低於國民黨政黨支持度，宋楚瑜的支持度遙遙領先親民黨政黨支持度，這二者的落差可證明宋楚瑜真正參選並不能衝高親民黨政黨票。

泛藍會產生棄保效應嗎？

洪秀柱會不會被換下來？這題目佔據所有政論節目的主軸，至今延燒半年，這背後的動機就是操作棄保的手段。目前民調表態率如果在80%，蔡英文大概在40％上下，另外40%就是洪秀柱與宋楚瑜。目前宋楚瑜的表態之後宋楚瑜約在20%-25%之間，洪秀柱在15% -20%之間，宋楚瑜如果在登記前無法接近30%或超越且讓洪秀柱更低於15%，恐怕難以產生棄保效應，過30%將對蔡英文產生重大的影響。反之，如果是棄宋保洪，蔡洪的差距就會大大縮小。就是說原本不投洪選擇蔡英文，因宋楚瑜出現，被匡住的選票會不會因棄保效應而凝聚泛藍票的選票？這是需要觀察的變化。

換柱的話題下，雖然洪秀柱的民調有走跌的趨勢，但更逼國民黨天王們，不得不表態支持洪秀柱，宋楚瑜參選逼迫朱立倫回到以馬英九為主的國民黨主流，朱王聯盟宣告結束，選後泛藍共主之爭已非國民黨黨內之爭。而朱立倫會善用手中黨產資源進行拉攏與安撫，尤其地方派系趁宋楚瑜的參選，當成手中籌碼，進行兩邊曖昧的關係。吳敦義更三不五時需要對外發表，不會參選2016總統大選，而王金平更不敢造反，面對如此困局，王金平不外乎三不政策，不脫黨、不批評、不積極，但私下對區域輔選依舊勤跑（這也是馬英九或洪秀柱設定王金平的角色）。

宋楚瑜人稱大內高手，一生在政治圈打滾，更懂個中三昧，所以宋楚瑜不會誤解，而是玩移花接木把虛轉實。威權時代的化妝師宋楚瑜，在民主化今天，只能畫畫自己，用華麗的詞彙，動容的表情，包裝個人，放在櫥窗或上上電視，還有一點餘韻，真槍實彈已經時不我予，只能再一次見識虛張聲勢的老宋。再配合宋楚瑜的三高操作，主打國家與兩岸的高度問題、透過媒體高度曝光、高度苦民所苦的庶民語言。但客觀條件有三弱：組織弱、資源弱、板塊弱。恐怕將黔驢技窮，讓選民看破手腳，長期持續戰下恐怕一如既往開高走低的選情。但宋楚瑜的參選，提高總統大選的熱度，也能衝高大選的投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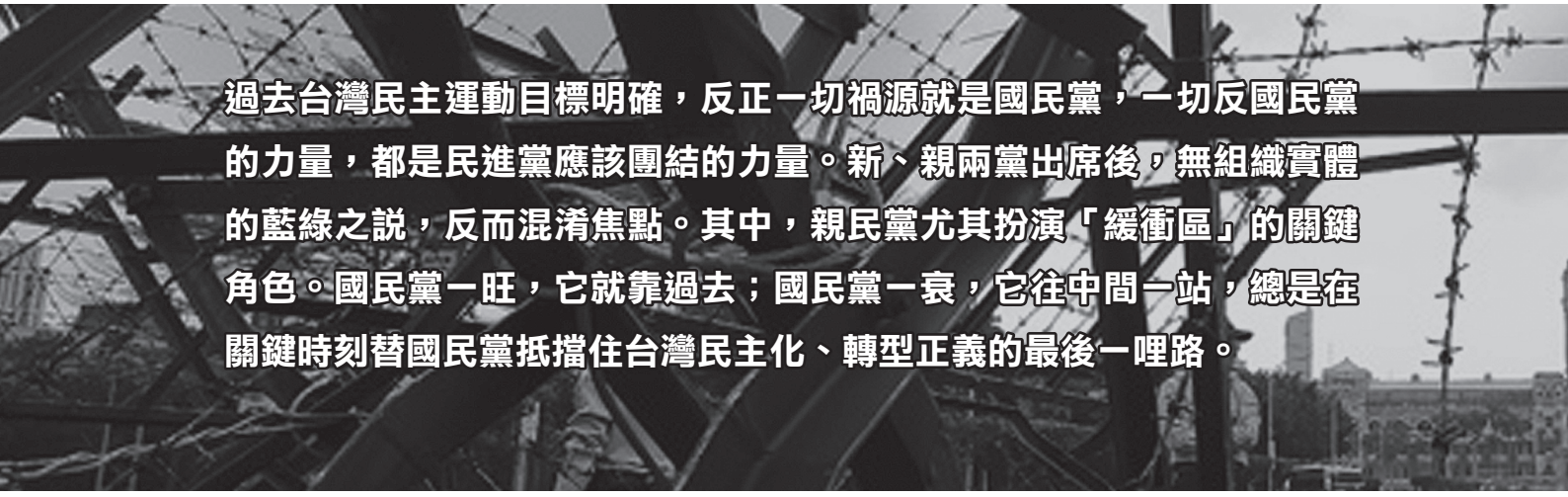
（洪耀南 / 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執行長）



換柱的話題下，雖然洪秀柱的民調有走跌的趨勢，但更逼國民黨天王們，不得不表態支持洪秀柱。

親民黨總是在關鍵時刻——替國民黨抵擋 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哩路

許龍俊



過去台灣民主運動目標明確，反正一切禍源就是國民黨，一切反國民黨的力量，都是民進黨應該團結的力量。新、親兩黨出席後，無組織實體的藍綠之說，反而混淆焦點。其中，親民黨尤其扮演「緩衝區」的關鍵角色。國民黨一旺，它就靠過去；國民黨一衰，它往中間一站，總是在關鍵時刻替國民黨抵擋住台灣民主化、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哩路。

戒嚴時代，除了聊備一格的民社、青年兩個花瓶黨，國民黨是唯一的從政出路。所以當時國民黨是個左右統獨兼容並蓄的大雜院，勿寧十分正常。

第一波的「出走」，大概從1950年代台灣有縣市長選舉就開始，沒被國民黨提名參選的地方實力人物，就以「無黨籍」身份競選。

最早的「無黨籍」比國民黨亂中有序的大雜院更混沌，歷經若干次選舉，漸而「提純」出「黨外」。「黨外」雖然也囊括左右統獨，但「制衡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共識十分明確。「黨外」招牌有助於當選，發展到後來乃有真假黨外之爭。

1970年代無名之黨「美麗島雜誌」時，真假黨外的定義逐漸釐清，到稍後1980年代初的黨外公政會、黨外編聯會時，就更加明確了。

組黨前夕，黨外發生一大一小論戰。大者「雞兔同籠」(選舉路線vs.運動路線)事件，最後雞兔合流。反倒小者「國台語之爭」，去除一部分反國民黨統派勢力，如夏潮、雷渝齊等皆未參加民進黨組黨；另一部分參與民進黨組黨的統派，如費希平、林正杰等，也很快的在建黨五年內離民進黨而去。

1991年底「台獨黨綱」，大概是民進黨台獨路線的最高峰，但也從此趨緩。



如果新黨出走是因為意識型態與李登輝迥異，宋楚瑜出走，就單純是權位之爭的結果。



新、親、台三黨的時間在解嚴後，亦非意識形態上的決裂，這也正是新黨、親民黨終究與國民黨牽扯不清的原因。

其後再度輪到解嚴、開放黨禁後、有競爭對手的國民黨分裂。分裂從蔣經國一死、李登輝接班就開始。先是真除黨主席之爭，後又主流/非主流之爭，但正式出走者，是右翼統派「新黨」。

如果說新黨出走是因為意識型態與李登輝迥異，宋楚瑜的出走，就單純是權位之爭的結果。宋在李登輝繼位之初，幫李擋掉宋美齡接黨主席一案，立下大功，卻始終要不到心儀的行政院長位置，羞憤出走競選總統，從而因他「個人」而誕生「親民黨」。

2000年連、宋、陳三腳堵的結果，民進黨執政，李登輝被逐出國民黨，精神領導「台聯」——這是1990年代國民黨內鬥以來，分裂出的第三個政黨，結果卻走到「極台」的市場區隔。

有些人喜歡和稀泥說，黨外、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台聯，還有現在的民國黨，均屬國民黨開枝散葉。這說法有待商榷；箇中有一條很明白的界線：黨外、民進黨是戒嚴時代，意識上與國民黨決裂出走的，而新、親、台三黨，時間在解嚴後，亦非意識形態上的決裂，這也正是新黨、親民黨終究與國民黨牽扯不清的原因。

現在大家所詬病的「藍綠」，其實是新黨、親民黨既離家又想繼承家產，才會形成所謂「泛藍」。在新黨、親民黨之前，哪有什麼藍？就一個國民黨，vs.黨外或民進黨。

當時台灣民主運動目標明確，反正一切禍源就是國民黨，一切反國民黨的力量，都是民進黨應該團結的力量。新、親兩黨出席後，無組織實體的藍綠之說，反而混淆焦點。

其中，親民黨尤其扮演「緩衝區」的關鍵角色。國民黨一旺，它就靠過去；國民黨一衰，它往中間一站、中流砥柱，總是在關鍵時刻替國民黨抵擋住台灣民主化、轉型正義的最後一哩路。

（許龍俊／1952年生，台灣雲林人。中山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美國麻州州立大學(U. Mass. / Amherst)社會醫學研究所進修。曾任台灣省牙醫師公會理事長、台灣建國運動組織召集人、台獨聯盟遷盟回台現身大會召集人、民進黨雲林縣黨部主委、民進黨中執委、國大代表、行政院顧問。2014年柯文哲競選辦公室政治暨策略顧問。現任李登輝民主協會總會常務理事、台灣團結聯盟中央黨部首席顧問、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董事、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在新黨、親民黨之前，哪有什麼泛藍？就一個國民黨vs.黨外或民進黨。

馬英九總統的執政回顧

編輯部

2016年總統大選將至，馬英九總統與執政團隊任期已進入最後倒數計時。時序拉回2008年，在民進黨低迷的選情中，馬總統以765萬票當選，得票率達到58.45%，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

憑藉著國民黨擁有立法院絕對多數的優勢，馬總統以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為口號，意氣風發的踏入總統府，但執政以來風風雨雨，馬總統心裡所想的似乎總是與人民背道而馳，民意支持度更探底至9.2%，競選時喊出的633政見也確定跳票，國民黨更成為眾矢之的。本篇特別就馬總統與執政黨上任以來，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國家政策推展進行回顧，讓讀者總覽馬英九與國民黨執政這八年來，對台灣造成的深遠影響。

《政治》

促發憲政改革

2013年馬總統與行政院長共同發動「9月政爭」，透過黨機器與司法的操作，想要拔除立法院長的職位，此舉已經跨越憲政民主的紅線，是嚴重違反「權力分立」的違憲行為，結果馬英九總統並未受到約束與制裁，權力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此外，國民黨長期透過黨紀處分來控制立法委員，打著貫徹黨紀的大旗，使得立委都必須聽從黨的指揮，這種黨國體系的運作模式，背離民主政治，完全不考慮人民的利益，代議制度可謂失靈。

綜合以上，馬總統與國民黨違背權力分立原則的種種濫權作為，突顯了台灣政治的憲政缺陷，帶出憲政改革的急迫性與必要性，也促發全民推動憲改的呼聲。

刺激青年參政

馬團隊執政以來，政府持續失能，從核四爭議、黑箱服貿到十二年國教，多項國家重大政策荒腔走板。此外，每逢抗爭就必然出現警察濫權、司法追殺，讓台灣的國際人權評比不斷倒退，而國民黨挾著在國會的人數優勢，罔顧民意、恣意妄為，一連串的倒行逆施，終於成功喚醒政治昏睡的台灣人民，讓年輕族群一改過去對政治的冷漠與畏懼，開始關心政治，不論是投書評論、走上街頭，或是直接投入政治活動，打開了當前政治被寡占的希望曙光。

司法改革

台灣司法一向為人詬病，馬總統上任後意氣風發的宣示推動司法改革，但轉眼間卸任在即，台灣司法似乎仍原地踏步，兩國際



國民黨透過黨紀處分控制立法委員，使得立委都必須聽從黨的指揮，代議制度可謂失靈。



教育部端出22K實習方案，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也有了政府背書的公定建議售價。

人權公約的國內法化進程停滯，評鑑機制無法汰除不適任的司法人員，司法檢調揣摩上意，遇到黨證會轉彎，推出四不像的觀審制度，而在2013年馬總統更與檢察總長黃世銘，攜手將整個司法檢察體系的公信力一次崩解。司法改革並非一蹴可幾，但有了馬總統的親身試藥，更加突顯出台灣司法的病徵，顯現出司法改革的急迫性。

《經濟》

青年22K低薪化

「大學畢業生起薪26700元，比八年前還要低！」馬總統2008年時競選廣告，以鏗鏘有力的一段話批評扁政府。但是根據2014年勞動部統計，大學畢業生起薪仍然維持在26000元左右，直到2015年起薪才緩升到27000元，轉眼間八年飛逝，萬物飆漲，唯有薪水仍在原地徘徊。

近年來，台灣生產結構僵化，產業創新停滯，生產方式仍維持委託加工，賺取微薄毛利，在此情形下，勞動成本遂為首要縮減重點。再加上中國勞動成本近年來逐漸攀高，廠商不堪負荷，相較之下台灣勞動成本下滑，教育程度高，尤其2009年教育部端出22K實習方案，猶如一帖強效補劑，除了全額補助22K薪資外，連同勞健保費也一併補助，許多企業都直接以政府補助額實施而未額外增加薪資，大學畢業生的起薪至此也有了政府背書的公定建議售價。

工資凍漲，受薪階級又悶又苦，但為了替慣老闆省荷包，大家要忍耐，除了用電優惠與減稅措施，勞動成本低廉也實為台灣投資的一大利多，無怪乎企業每次嚷嚷出走，卻還是留在台灣。

濫發消費券

為了促進景氣活絡、提振消費，馬總統剛上任就特別舉債856億元，提出發放消費券的方案，並強調這是「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

但他們始終沒發現，薪資負成長才是實質購買力倒退的根源，結果消費券發放後加成效果未顯現，GDP增加不到600億，前後虧了200億以上，也犧牲政府往後的舉債空間，排擠建設預算，負債數百億換來一場空。

傾中導致產業空洞化

檢視馬總統任期內的經濟政策，絕大部分都是強化與中國的聯結，除了兩岸直航、開放中客、開放中資，鬆綁台商西進等，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消費券發放後加成效果未顯現，前後虧了兩百億以上，負債數百億換來一場空。



政府顯然低估了物價的波及連鎖反應，油電雙漲導致成本上揚，產品價格將迅速反映，到頭來還是得面對民生價格全面性上漲。

的簽定，持續深化與中國經濟的連結。

馬總統念茲在茲的「開放」，實際上是向中國傾斜的毒藥糖衣，不但未救起沉痾的台灣經濟，反而使人民陷在更深的困境裡，而國民黨在立院未善盡監督之責，卻扮演放水的角色，球員兼裁判，加快產業外移，資本、技術和人力向中國流出，產業空洞化使得薪資停滯，使台灣成為「依賴而不發展」的國家，使民眾重新檢討對於中國經濟依賴的可行性。

油電雙漲 民生苦

2012年馬總統高喊公平正義，啟動油電雙漲，不僅推升物價，更侵蝕了經濟成長率，對於當時低迷的景氣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政府顯然低估了物價的波及連鎖反應，認為油電雙漲僅只影響於生產部門，而不致衝擊民生物價，但成本上揚，產品價格將迅速反映，到頭來還是得面對全面性民生價格上漲。

反觀台電與中油都是獨占事業，成本漲則價格要漲足，成本降則價格只降一半，這般調整價格能力絕非一般民營事業能做到的，更不用說台電以高於市價向民間電廠購電；而生產部門享受租稅、電價優惠，躲在政府補助的保護傘下，油電雙漲最後傷害的還是民眾，絕非公平正義，而是劫貧濟富。

《社會》

促統 台灣認同創新高

馬總統執政初期，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訪期間，動用超高規格維安，超過七千名警力，此外發生多次警方執法過當，警察保護五星旗而驅逐民眾引發不滿，實為國民黨上台後提升台灣認同之濫觴；之後多次有辱國格之作為，不論是中國官員來訪撤下國旗，退休將領赴中唱和，國民黨強推服貿，委託國台辦代為提交亞投行申請書，均有損我國主權，間接促使台灣認同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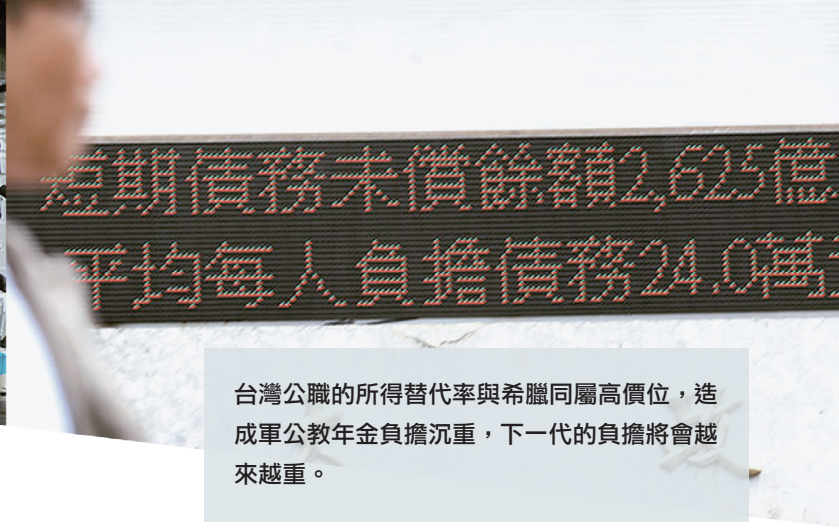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1992年起，長期對國人的統獨立場、國族認同進行調查，根據2015年1月公布的民調顯示，國人支持台獨的比例達23.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達60.6%，雙雙創下該機構這項調查的歷史新高，此外，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都降至歷史新低的32.5%及3.5%，身為凝聚台灣認同的推手，馬總統與國民黨可謂功不可沒。

惡化居住不正義

馬總統在2008年競選時曾表示，高房價



政大選研中心2015年的民調顯示，國人支持台獨的比例達23.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達60.6%，雙雙創下該機構的歷史新高。



台灣公職的所得替代率與希臘同屬高價位，造成軍公教年金負擔沉重，下一代的負擔將會越來越重。

代表人民看好台北市的經濟與發展，證明他市長任內的政績受到肯定，對比競選對手謝長廷先生；但近幾年來，高房價已成為民怨之首，馬政府調降遺贈稅、營所稅等，吸引了資金回流，因為投資標的減少資金多數灌入房市，再加上打房不如預期，房地合一課稅政策七折八扣，政府帶頭賤賣國土，允許財團割地為王，一時投機炒作盛行，房價高漲，台北市房價所得比甚至全球居冠，在普遍薪資低迷的情況下，多數青年只能望房興嘆，只能說馬總統當時頗具遠見，不惜打自己的耳光，以突顯台灣居住的不正義。

核爭議提升環保意識

核四議題困擾台灣將近30年，2011年的日本東北海嘯重創福島核電廠，一夕之間廢核聲浪高漲，加上核四施工期間事故不斷、轉包、分包問題叢生，使得核四成為了一顆不定時炸彈；馬總統曾一度想強行運轉核四，也因此引發了民間激烈的反核活動，隨後國民黨更提出的廢核鳥籠公投，也在高漲民意反對下無疾而終。

核能議題在馬總統與國民黨的操弄過程中，除了同時深化台灣的民主，讓人們親身了解現今鳥籠公投法的扭曲程度，同時也提升了全民的環境意識，促成邁向能源永續發展的重要共識，各界因而積極投入永續能源的討論，以及檢討台電的供電設備與用電政策。馬總統可能始料未及，他所引起的政治紛擾，竟也成為一場提升公民環境意識的盛會。

提升軍中人權

軍中人權一向黑幕重重，13年來從軍死亡人數高達2088人，以自殺結案的有332人，平均每年有26人死於輕生，且不當管教、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軍審制度始終疑雲密布。2013年洪仲丘下士遭不當管教致死，在軍檢調查過程中不斷的推諉、掩蓋，引發民眾強烈不滿，最後在馬總統關鍵性的一句「我管定了」，成功發動25萬人上街，以群眾力量廢除軍審制度，現役軍人非戰時犯罪均回歸一般司法機關追訴、審理，也避免冤案遭到國防布河蟹處理。

激化世代矛盾

希臘公職的福利優渥、高額的退休俸與在職期間領的薪俸相距不大，因而拖垮了國家財政，只能向歐盟不斷的舉債。而台灣公職的所得替代率與希臘同屬高價位，造成軍公教年金負擔沉重，加上少子化趨勢，政府多次為大戶減稅，導致稅基緊縮，台灣下一





國教政策倉促上路，馬總統兌現了政治支票，苦的還是往後好幾代無所適從的學生。

代的負擔將會越來越重。

如此獨厚軍公教的退休制度，造成嚴重的階級對立，政府財政亦難以負荷，問題迫在眉睫；而馬總統任內對於年金改革視而不見，每逢選前必定端出軍公教年金優惠牛肉，而勞工的負擔卻是與日俱增，成功突顯出世代不正義，促使年金的改革聲浪。

《教育》

十二年國教推動失利

教育為百年大計，馬總統卻能以極短的時間，快速推動十二年國教，先求有不求好，堪稱台灣教育奇蹟。

最早扁政府也有醞釀十二年國教的想法，但討論多年仍無共識；2011年的元旦文告，馬總統突然宣布要在2014年以前實施十二年國教，使得教育部只得倉促籌備，趕鴨子上架。理想的國教制度應盡量達到，學生能就近、適性入學，打破明星學校藩籬，大部分免試入學，全面免學費等目標，但政策倉促上路，保留了明星學校，假免試真會考，全面免學費在政府喊窮的狀況下，也設了不高不低年收入148萬元的門檻，最終國教政策東拼西湊，馬總統兌現了政治支票，苦的還是往後好幾代無所適從的學生。

品格教育淪笑柄

馬總統甫上任宣布全面推動「台灣有品運動」，預訂將支出12億元教導全國學生做人要有品德，首次活動記者會就包下台鐵車廂，浩浩蕩蕩上百名記者及官員陪同馬總統坐火車「說品德故事」，也邀請多位名人擔任「有品大使」，如此八股、教條式的活動，有無達到效果見仁見智。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馬政府執政期間，總統與官員相繼失能失言，國民黨多次爭議舉止、貪污舞弊，一方面做了品德最負面的示範，一方面也提供了樣版教材，讓學生們透過所見及反思，自然而然會培養出獨立人格。

《國防外交》

執政失利 國際關注

馬總統執政以來，多次成功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包括洪仲丘下士遭不當管教致死所引發的「萬人送仲丘」，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引起的「太陽花學運」，到最近黑箱課綱激起的「占領教育部」，均成功獲得國際媒體版面。

而台灣多次受到國際期刊的矚目，馬總







太陽花學運延燒，《經濟學人》雜誌報導中以「困境中的鹿茸」為題，描繪馬英九的困境。

統也稱的上厥功甚偉；英國《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2012年底以「笨蛋，馬英九」（Ma the bumbler）為題，評論馬總統執政以來薪資停滯、房價高漲、出口衰退，民調創歷史新低，使得全國似都同意：馬先生是個沒用的笨蛋（Mr. Ma is an ineffectual bumbler）。另外2013年《經濟學人》也引述「國際透明組織」年度報告，分析全球貪污狀況，報告顯示台灣每100人中，有36人在過去一年曾以賄賂取得公共服務，貪污指數高達36%，排名世界第18名，遠超過全球平均貪污指數27%，比扁政府時期更加嚴重。2014年太陽花學運延燒，《經濟學人》報導台灣的服貿議題，以「困境中的鹿茸」（On the antlers of dilemma）為題，描繪馬英九困境，被網友戲稱的鹿茸已獲得「國際認證」！

自爆九二假共識

根據馬總統在2008年提出「活路外交」競選政見，主張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互不否認的情況下，與對岸展開務實協商，尋求彼此雙贏的平衡點。惟中國對於「九二共識」始終與「一個中國」劃上等號，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其領土的立場始終未有任何妥協，因此馬總統的「各自表述」明顯是一廂情願。

因此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活路外交」，只有將台灣矮化成香港一般的地位，在中國允許下，於所劃定的小圈圈內參與國際事務，這從2009年衛生署署長葉金川，出席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事後被「維基解密」戳破，是中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同意葉金川以「葉教授」的私人身份參與，而非官方身份即可瞭解。馬總統親身利用活路外交，戳破九二共識的糖衣毒藥，可謂用心良苦。

募兵制引眾怒

募兵制在台灣討論已久，因配套與共識不足，多屬緩步試行階段；惟馬總統在2008年參選時，高喊全募兵制政見，宣示四到六年內完成，結果主政後推動全募兵制遭遇重重困難，政策反覆，打亂很多人的生涯規劃，而募兵制大幅增加的人事經費，在目前財政赤字與沉重的退輔基金包夾下，已然排擠訓練、軍購、裝備維護等經費，加上兵員募集不理想，募兵制已確定遞延。

馬總統在任期內，以極短的時間，親身試驗了全募兵制在台灣的成效，無論結果好壞，均為下一任執政團隊的國防募員政策提供了最真實、血淋淋的參考數據。

左右搖擺的蔡英文

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平衡上、蔡英文在這一方面保持空白，讓利益團體得以創造想像空間，但也同時引致各方的批判。蔡英文在當選後，究竟會成為一位謀求社會正義與公平分享的左傾總統，還是維持現有經濟發展與分配模式的保守派領袖？

周偉航

2016年的總統大選，依主要候選人的民調與政治版塊推移來判斷，蔡英文應該是最有可能出線的候選人。蔡英文現有的模糊中立路線，基本上就是為了對應如此的選情優勢。不論是在兩岸、環保、社會福利，甚至細如死刑存廢的議題，蔡英文都主張訴諸公議，以建立社會共識的方法來規劃長期的解決方案。

在各種「蔡式模糊」的議題中，有個領域的模糊特別令人玩味，就是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平衡上。蔡英文在這一方面保持空白，讓利益團體得以創造想像空間，但也同時引致各方的批判。蔡英文在當選後，究竟會成為一位謀求社會正義與公平分享的左傾總統，還是維持現有經濟發展與分配模式的保守派領袖？

為了推敲蔡英文的可能走向，必須由其選戰策略談起。蔡英文在經歷2012的選舉失敗後，就選舉實務面來看，她做了幾個調整。第一，更加強化基層拜訪的組織行程，且深入傳統為國民黨所掌握的職業公會、宮廟與地方意見領袖的層級。第二，結合公共知識份子，建構輿論反應機制與相關人脈，預先化解可能的反對力量。第三，採取中間路線，擴大選戰基礎。

重點就在於第三層次。在2012年的選舉對陣過程中，相對於馬英九力挺財團的經濟「右」派形象，蔡英文即便沒有太多表述，



蔡英文經歷2012年選舉失敗後，改採取中間路線，擴大選戰基礎。



仍被刻意往「左」擠。這一方面讓她失去企業支持，另一方面也把她逼往左派較小的選票基礎。

似乎正是有鑑於此，她在2012年後，對於相關議題開始採取模糊中立的態度。在假設左派不可能支持國民黨候選人的狀況下，她開始有些「向右靠」的公開行程，並在拜訪企業活動過程中出現一些「失言」，像是「台灣假放太多」「年輕人一人要當兩人用」等等。

雖然民進黨方面立刻澄清其意旨，但這樣的放話手法，其實已讓她在定位上穩固的居於中間：左右雙方都對她有不滿與懷疑，但雙方也都各自在她的語言中找到能滿足自己的亮點。

就輿論面，國內的經濟左翼勢力雖然長期不滿蔡英文的態度，但在「執政優先」的考量下，外加自身政治實力不足，票源不夠，通常不願正面與蔡英文起衝突。相對來說，國內的經濟右派財閥，在考量蔡英文勝選機



2012年選舉對陣中，相對於馬英九力挺財團的「右」派形象，蔡英文即便沒有太多表述，仍被刻意往「左」擠。



國內的經濟右派財閥，考量蔡英文勝選機率較高的狀況，寧願與其保持「相敬如賓」的態度。

率較高的狀況，也寧願與其保持「相敬如賓」的態度。

就組織選票面，這種中立情境之所以能夠奏效，還在於左右兩極的政治力量都推不出夠強的候選人把她往另個方向擠，或是壓縮其選票空間，因此蔡英文就得以長期保持這種戰術，直到投票剩不到六個月的今日。

但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蔡英文會保持這種態勢到什麼時期？她可能在選舉之後改變現有的立場嗎？

承繼之前的概念，蔡英文的相關動作背後都有政治考量，因此筆者認為即便她當選，她所有的動作仍然會保持一貫的政治脈絡，但可能出現一些改變，改變的方向端看她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而定。

蔡英文若當選，她就開始面對「連任」的議題，因此她將持續保持選舉思維與戰略。然而現任的總統做為候選人，情勢與在野者不同，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國會多數黨的問題。

若民進黨可以乘著選前六個月的聲勢，拿下穩定過半的國會席次，蔡英文可能會有比較明確的政治動作，具體往右或往左明顯推進。

往右的考量，在於手中的席次已足，不用在意左派力量（黨外社團與長期隱藏「黨性」的新潮流）的威脅，以右傾強化自身的政治支持力道，朝2020大選邁進。

往左的考量，在於穩定過半的國會可以進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在2020大選之前，引左傾手法加上轉型正義，徹底瓦解國民黨



蔡英文若取得越大越穩定的權力，往右靠的機率就越高，若其政權越不穩定，就可能適度擁抱左派基調，以刺激政局往自身有利的方向傾斜。

等的在野藍色力量。

兩者相較，依常理推估，顯然前者的成功機率較高，因為後者如果操作失敗，將會引發嚴重的政治波動，這不符合蔡英文一貫的行事態度。

其次，如果民進黨只有接近過半，或是必須結合親民黨、台聯、無黨盟才能過半，其態度就會相對保守，但還是可能往左或往右，端看這些結盟小黨所傳遞的左右價值意念為何。

舉例來說，若結盟小黨展現強大的右派形象，蔡英文可能會站在對立談判者的角度與小黨協商，並在最後得出約略往右靠的結論。但這樣的作法是要向自己的支持群眾表態，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得更進階的政治利益與立法實效所做的犧牲。

相對來說，若結盟小黨展現走向左派風格，蔡英文亦會演出一場協商秀，並往左派略靠，並對財團與右派勢力表達這是為了政

治穩定而不得不為。

考量較有實力的小黨，都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右派根底，因此蔡英文在此種狀況中右傾的機會仍較高。

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就是立院再次出現朝小野大的格局。蔡英文應該不至於出現如陳水扁長期搖擺，最後找不到方向的困境，因為兩人的問政風格不同。然而，面對朝小野大的格局，蔡英文還是有兩種取向的可能性。

首先，她將保持現有的選舉基調，以模糊中立的角度出發，並把這種模糊推給不配合的國會。因為國民黨（或國民黨與小黨聯合過半）必然往右靠，因此蔡英文本人只需採取「緩衝」的立場，以社運團體或側翼政團的激烈反應為要脅，製造出她想要的中立結果。

這代表在朝小野大之下，仍可能有瀕發的社會運動，只是發動方向轉而針對國會。

其次，她可能選擇微微向左的路線，刻意提出諸如年金改革、資產稅等社會重分配法案，並讓這些法案在國會衝撞。提出這些法案的意圖並不在於「通過」，而是透過協商的過程以取得右翼力量在其他政治權力方面的退讓，例如預算案等年度例事。

上述兩種狀況所得出來就是中間與略左，因此如果出現朝小野大的格局，蔡英文可能採取中間偏左的策略。

總結來看，蔡英文若取得越大、越穩定的權力，往右靠的機率就越高，而若其政權越不穩定，越受限，就可能適度擁抱左派基調，以刺激政局往自身有利的方向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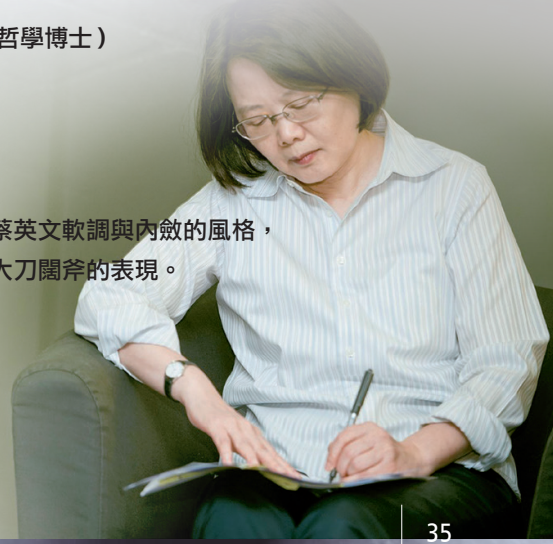
然則以上的推斷，都是基於一個預設，即蔡英文並不是一個本質上的經濟左派，而是因為政治的定位而成為當前經濟左翼較有意願接受的候選人。這種「接受」能持續多久？這些容易激動，政治犧牲意願較差的經濟左派，是否在蔡當選後仍然可「相忍為國」？這些問題都值得觀察。

雖然經濟左派缺乏政治實力，但還是擁有相當強大的輿論砲管與社會動員能力，絕對能造成執政者一定程度的困擾。如果蔡英文在執政後對此拿捏失據，很可能陷入左右不逢源，裡外不是人的困境。

或許蔡英文強勢執政後，率爾發動政治改革，擊碎右派政黨力量，就可以轉移經濟左右的論爭焦點。但性格決定命運，蔡英文軟調與內斂的風格，實在很難期待她會有大刀闊斧的表現。

因此，在2016到2020的這段時期內，最有可能發生的結果，或許是台灣對於社會正義的要求不斷加劇，而政府仍拼命尋求多方的賽局均衡，力求政權不失。

（周偉航／輔仁大學哲學博士）



性格決定命運，蔡英文軟調與內斂的風格，很難期待她會有大刀闊斧的表現。



先學會成為人 再學會當學生

黃靖茹

反對課綱微調，實際上就是讓學生從教育的客體轉為主體，思考自己為何而學、該學什麼、如何學習，而不是不明不白的被灌輸了知識，再渾渾噩噩的遺忘。這一次，我們做自己的主人！

那是一個悶熱難熬的午後，亟欲離開學校，正等待放學的我，緊盯小小的手機螢幕裡大大的世界，不顧台上老師講課講得口沫橫飛。「真希望景美女中也有反課綱的粉絲專頁啊！」我嘆了一口氣心想。但靈機一動，又覺「何不趁這股氣勢，讓景美女中的學生更了解自己的權力甚至更了解社會？」在一股衝動下，建立了粉絲專頁，開始著手在茫茫人海中尋找同伴。

第一個周末，我們的團隊只有三人。卻有效率地讓粉絲專頁的運作上了軌道，因此景美女中也上了新聞，在滿滿的反課綱學校中佔了一隅。那時我還相當畏懼校園中避談政治的潛規則，而在同學興奮地說：「黃靖茹，你看！景美女中也有欸！」的時候，羞於啟齒道：「我知道，因為那是我領導的。」

為因應即將來到的期末考與暑假，我們倉促地在學校舉辦了一次短講。選擇在校園地標——心之舵前演講，那時我說：「反對課綱微調，不只是希望教育部可以撤回這個違法、去除台灣主體性的課綱，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堅定地在學習的道路上往自主與自由航行。」反對課綱微調，實際上就是讓學生從教育的客體轉為主體，思考自己為何而學、該學什麼、如何學習，而不是不明不白的被灌輸了知識，再渾渾噩噩的遺忘。這一次，我們做自己的主人！

六月底，領著「反黑箱課綱・景美女中站出來」團隊加入「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那時每個學校代表、每個組織成員都小心翼翼的。因為我們多數是沒有社會運動參與經驗的學生，害怕一個疏失成為眾矢之的、害怕政黨介入造成負面影響、害怕ＮＧＯ不友善的回應，太多不確定，只能帶著理想硬著頭皮試試看。



反對課綱微調，不只是希望教育部可以撤回這個違法、去除台灣主體性的課綱，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堅定地在學習的道路上往自主與自由航行。

還記得青澀的我們，在第一次記者會前特別開了一個三小時的會議，連記者會上的喊口號橋段都要排練。記者會上，我站在同學們前面，手握大聲公面對一字排開的媒體，喊完口號後回到隊伍中的我，手是發麻不能動彈的。

七月五日，在一連串會議的轟炸下，促成我們的第一場行動。那時我還不敢上台面對滿滿的民眾、學生發表演說，在台下為民眾做噴傘的服務。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那麼熱烈且川流不息的人潮，每一個人都殷切期盼你為他的傘、衣服、書包，噴上反課綱的標語。我們雖然疲累而焦急，仍然盡力的承接每一個支持民眾的熱情。並且舉著布條遊行至教育部前，將我們的心聲摺為紙飛機，願其能飛入部長的心中。

七月十三日，我們看不見教育部有任何回應與誠意，因此決定來到國教署前陳抗。誰知，有學生發現門外的鐵門竟是沒有被鎖住的，也就一一開始扛起鐵門並衝入國教署，想請署長回應。我在外扛著鐵門，憂心進入國教署的夥伴不能從正門出來，喊著口號要求警察讓學生安全回來並且保證請官員回應我們。汗水、淚水、鐵門上的油垢在臉上橫竄，我們何嘗希望如此？最後，我們以為是副署長的官員，竟其實只是小小的副組長，在行動後才知被國教署及警察擺了一道，人人都厭憎起滿口謊言、不負責任的政府。



我們站出來，因為顢頇的政府撕毀了與人民的互信基礎；我們站出來，因為多元的台灣主體價值需要由台灣人自己守護。

七月二十二日，即使在諸多區域性反課綱組織及ＮＧＯ的不看好下，我們仍然舉辦了夜宿教育部的行動。那日，我帶著因緊張而無法入眠、進食的虛弱身體，淋著雨在台上演講。我們站出來，因為顢頇的政府撕毀了與人民的互信基礎；我們站出來，因為多元的台灣主體價值需要由台灣人自己守護；我們站出來，因為學生不再是教育的過客，而該有權決定自己的教育和未來；我們站出來，因為我們不容許中華民國政權再次複製七十年來毫無反省的去台灣化、洗腦教育；我們站出來，因為我們要光明的歷史、要光明的台灣！



我們站出來，因為學生不再是教育的過客，
而該有權決定自己的教育和未來。

這場行動中不只邀請民眾上台發表意見，更讓民眾能在拒馬上的白布、馬路上彩繪與書寫自己的心聲，那一夜，我不只看見蠟燭點燃的傘壟罩台灣的教育，更看見彩色的粉筆勾勒出台灣人民對未來的期待。

七月二十三日晚間至七月二十四日凌晨，我們不滿於政府視若無睹的態度，決定衝入教育部。佔領部長室後不久，大批警力就趕到現場。我們手勾手坐在部長辦公桌前，喊著口號，不具任何威脅。但我仍看見夥伴被三名警察拖行、架住並摔落，暴力在我眼前赤裸裸地上演。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大哭，也不知道自己正害怕的踢腳，只是不斷喊著口號，寄望給自己與夥伴力量，更要讓世界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在某個政府機關大廳等待警察將我們送往保安大隊的過程，有夥伴唱起了「警察先生，請你聽我說」一曲，原本收拾好情緒的我，眼淚又簌簌地流下。我是一個在校園中懼怕教官、服從師長的學生，難以想像應該做為人民保母的警察，卻是強行拉起我並壓制我，扯著我的雙手反綁在背後並上束帶的，威權國家的打手。

而後，我們都累了，一個個的靜下。我靠在夥伴的手臂上，閉起眼睛看見了基隆老家外的海岸。藍綠色溫柔的海面緩緩起伏著，像奶奶平緩又讓人安心的心跳。忽然，那個勇敢無懼的我消失了，我在夥伴的肩上嚶嚶哭泣並說道：「我想念阿嬤，我想家。」

終於在保安大隊的折磨與少年法庭的解釋下，擁有自由的身體並迎接璀璨的太陽，以為運動能在我們的努力下成功。誰知，七月三十日早晨，大林自殺的新聞佔了滿滿的臉書版面。我不敢相信，那個總是幽默逗著我玩的大林；那個在行動時一肩扛起責任的大林；那個穩重成熟帶領我們的大林；那個在723行動前溫柔對我說：「要相信自己，相信運動。」的大林，竟然離開我們。我躲在衣櫥裡嚎哭，不願意相信他真的那麼傻，為了反抗這個獨裁政權的蠻橫自殺，我能相信的是，溫柔如他，必承受了許多情感、責任與痛苦，願他自由。

那日，剛好要確認每一位參加723行動的成員，是否願意與部長低頭道歉，換得撤告一事。我憤恨難平的發誓：「這一輩子絕對不跟中華民國政權低頭！」七月三十日晚間，我們聚集在立法院及教育部門口，不只陳抗，也為大林唱了生日快樂歌。然後我們轉而面對這個無可撼動的政權，搖晃阻擋民意的拒馬，踏過割傷民主的蛇籠，佔領教育部前的廣場。這一夜，壓抑的仇恨終於沸騰了，高中生的星星之火終於燎原。

一週來，每一個人疲於奔命地在抗議的熱血與自我的混亂與疲累中掙扎，所幸，此刻的我不再弱小。我能夠擁抱滿是心傷的夥伴，能夠親吻不再懷抱希望的夥伴，能夠穩健面對蜂擁的人潮，能夠靜下心思抽離現場寫出文章。但學生的精力與能力有限，作為社會中相對弱勢、沒有投票權只能任由大人

擺佈的高中生，我們抽乾了身體中的每一口氣，只為延續大林的最後一口氣。卻仍然喚不回教育部長做教育的良心，得不到光明自主的未來。

不只因為颱風來襲，更因為我們再也沒有多餘的體力與精力和教育部僵持，因此選擇退場。被迫成長與假裝堅強的我們，終於潰堤，但流下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滴淚水、每一滴血，都將流入台灣這塊柔軟的土地，做台灣的肥料，期盼台灣人民自主、自由的一天；期盼被壓迫的台灣人民奮起的一天；期盼台灣人民謹記歷史並點亮未來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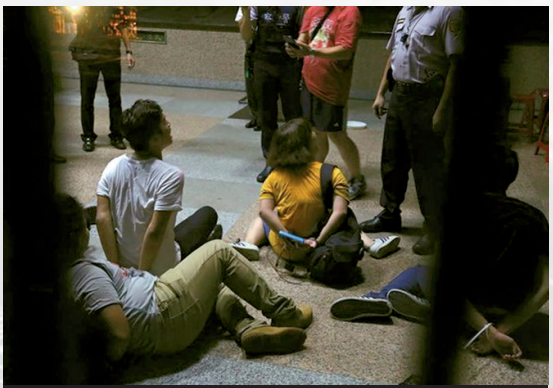
開學後，學生各個回到學校接受教育，接受的卻是與顢頇政府如出一轍的威權教育。多數學校除了校規不合理，甚至以人治手段掌控學生，違背民主法治精神。多數學校都還在黨國的陰影下，行朝會、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徵文比賽的活動，甚至放任軍人在校園中掌控學生的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更讓人心寒的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只能在校園中以銅像仰慕領導中華民國政權，來到台灣屠殺、迫害、洗腦台灣人的蔣介石。

反對課綱微調，是反對獨裁的政權遂行威權的教育。綁架了學生自主的思考與判斷，綁架了學生的未來，綁架了學生作為人的意志。沒有光明的歷史，可以開創光明的未來，先學會做為人，再學會做學生。即使長路漫漫，我們都已經踏在前往台灣未來的路途上，腳踩的每一步都深陷前人的溫柔與血淚中，我們沒有理由放棄作為一個自由自主的人；我們沒有理由放棄作為一個勇敢的台灣人；我們沒有理由放棄與獨裁者搏鬥的一口氣；我們沒有理由放棄為台灣的未來盡一份心力。

（黃靖茹／《反黑箱課綱　景美站出來》總召、《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論述組、景美女中高二學生）



夜宿教育部行動的那一夜，不只看見蠟燭點燃的傘映照台灣的教育，更看見彩色的粉筆勾勒出台灣人民對未來的期待。



反對課綱微調，是反對威權的教育綁架了學生自主的思考與判斷，綁架了學生的未來，綁架了學生作為人的意志。

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這一場由高中學生所發起的反洗腦運動，所爭取的，不僅是教育的主體性，更是思想的自由。在這一場運動之後，台灣社會應該徹底反省我們的教育體制，進一步審視我國現行的課綱制度，應該如何修正？才能還給下一代一個獨立思辨的教育環境。

鄭麗君



課綱的調整，違背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的制定程序，此外從草案研擬到審議，都用黑箱不公開的方式進行。

從六月以來，來自全國各地超過三百所高中，陸續串連，紛紛成立反黑箱課綱社團。七月以後，學生們更直接走上街頭，聚集在教育部前面，抗議政府藉由黑箱作業的課綱微調，強行推動政治洗腦教育，同時要求教育部長應該立即撤銷黑箱新課綱。學生們的訴求理性而堅定，令人非常感動，這是一場為自己爭回教育主體權的運動，而每一位高中學生都是主角。

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

學生們為什麼堅持黑箱洗腦課綱非撤銷不可？因為此次課綱微調，違反程序正義也涉嫌違法，首先，課綱的調整，竟是由所謂教科書檢核小組，以臨時動議的方式來發動，逾越了該小組只能進行教科書名詞檢查的職權，違背一向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的制定程序。此外，從草案研擬到審議，都用黑箱不公開的方式進行，檢核小組以及教育部任命的課綱審議委員名單、會議紀錄、會議錄音、錄影等資料，不但不公開還被當成國家機密。

而去年1月25日，教育部所舉行的的高中分組課審會，在審議新課綱時，甚至涉嫌作弊。依據教育部長吳思華在與學生座談時，親口承認，當時的會議主席，並沒有在會議進行中當場開票，公布是否同意課綱微調的審議結果，而是收回委員的書面意見，在散會後才進行統計開票，違反基本的民主程序；而其統計方式，依據台權會控告教育部資料黑箱的法庭觀察紀錄，教育部律師承認，教育部把「尊重多數意見」當做「同意」，把「沒有明確反對」也當作「同意」，這不是作弊是什麼？

至於最後研擬出來的社會領域微調課綱，不僅偏離歷史事實，更試圖打壓台灣的多元文化，回歸獨尊大中國意識及黨國史觀，走回戒嚴時期的洗腦教育，還在公民科課綱刪掉白色恐怖的事例，淡化台灣曾有過的國家暴力，完全背離大家所共享的民主價值。如此黑箱製造出來的洗腦課綱，我們的高中學生怎麼能接受？當然非撤銷不可！

然而，面對學生們的抗議，教育部堅持不願撤銷新課綱，卻表示新舊教科書都可以使用，有爭議的內容不考。聽起來好像有所



如果有爭議就不考，在考試領導教學的壓力下，老師如果選擇不教，學生也就不用讀，那麼多數台灣史便從學習中消失了。

讓步，其實卻是一個大陷阱。因為依據學者統計，所謂微調，台灣史內容的調整幅度卻有六成之多，如果有爭議就不考，在考試領導教學的壓力下，老師如果選擇不教，學生也就不用讀了，那麼多數台灣史的內容，在不教不讀下，便從歷史的學習中消失了。況且，只要現行舊版教科書的執照期限一過，所謂新舊並陳的情形也自然消失了，結果便是全面回歸新課綱。

更嚴重的是，課綱微調若不撤銷，正在制定中的12年國教新課綱，勢必是以此為基礎來編寫，形成12年一貫，以洗腦教育為主的反民主課綱，影響層面將擴及高中以下的國中、國小所有學生。難道，屆時連國中小學生也都必須站出來抗議政府嗎？



教育部面對出生成長於民主化後的年輕一代，還是一副威權心態，逼的學生用學運來教育教育部什麼是民主！

學生用學運來「教育」教育部什麼是民主

令人遺憾的是，教育部對於學生的呼籲，不但不檢討，還用權謀話術來敷衍，甚至加裝鐵門，陳設拒馬，把學生當成敵人看待。教育部帶著威權的心態，始終看不見問題就出在自己，不思檢討反省黑箱作業引爆學運，還宣稱這只是意見的分歧，微調程序只有小瑕疵；甚至更進而抹黑學運來轉移焦點，還要各高中校長加強對學運的危機處理能力。做錯事的政府不先道歉、不自我檢討，卻反過來指責學生的抗議，這不是做賊喊捉賊嗎？我們必須說，教育部根本沒有資格來教導學生什麼是民主政治，什麼是法治。面對反黑箱課綱的學生，重點不在溝通的技巧，而是教育部面對出生成長於民主化後的年輕一代，還是一副威權心態，逼的學生用學運來教育教育部什麼是民主！

我們必須奉勸教育部部長，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教育部該有的作為，只有一個，那就是馬上撤銷黑箱洗腦課綱。我們也期盼，能有更多的家長、老師們挺身而出，一起來阻止黑箱洗腦課綱，為下一代堅守一個多元而民主、在地而真實的教育環境。

課綱制度何去何從？

這一場由高中學生所發起的反洗腦運動，所爭取的，不僅是教育的主體性，更是

思想的自由。在這一場運動之後，台灣社會應該徹底反省我們的教育體制，進一步審視我國現行的課綱制度，應該如何修正？才能還給下一代一個獨立思辨的教育環境。

我國各教育階段的課程綱要，分為總綱，以及各領域的領綱。總綱規範了學生學習的科目、時數、與性質；而領綱則決定了教科書的書寫架構與內容。此次，反黑箱課綱運動的爆發，就是因為教育部用黑箱有瑕疵的程序，修改社會領域歷史、公民、地理的領綱內容，而修改的結果，卻以虛假來取代真實，引起高中學生與台灣公民社會的挺身而出，反對政治介入教育，拒絕由上而下灌輸一元觀點。

回顧我國課綱制度的演變，是在民主轉型下，人民不斷爭取教育主體權的歷程。從戒嚴時期，統一由政府編寫教科書，決定教科書的內容，轉變為一綱多本，由政府制定課綱，開放民間出版社依據課綱來編寫教科書，可是又透過教科書審訂制度，要求教科書必須送審取得執照後，才可以供學校選書之用。然而，雖然課綱制定及教科書審定的委員會大多由民間人士所組成，但由於現行法制缺乏完善規範，產生政治介入教育的流弊。

有鑒於此，我們認為課綱制度，應該透過修法，啟動短期與長期的改革行動。

短期而言，我們主張必須以法律明定課綱的研擬及審議制度，要符合公開透明、由下而上、專業治理，以及廣泛社會參與溝通等原則。不能再讓教育部以黑箱作業，用秘密、不公開的臨時編組，由上而下，排除專業與拒絕公眾溝通的方式來制定課綱。而且各領域的領綱也應該簡化，僅就大方向上作指引，刪除繁複的說明，給予民間教科書更大的編撰空間，甚至應該考慮，廢除現行的教科書審定制度，進一步賦予民間編寫教科書的自由，並落實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9條的教師選書權。



雖然課綱制定及教科書審定的委員會大多由民間人士所組成，但由於現行法制缺乏完善規範，產生政治介入教育的流弊。

長期而言，在12年國教能真正落實免試升學的精神之後，我們應該考慮，由國家制定課綱逐步走向課程自主，可以參照其他教育先進國家，由教師專業社群之間的教案合作與交流，研擬出各自合宜且不斷演進的教學內容，真正落實人民的教育主體權，完成台灣的教育民主化，也才能徹底杜絕國家機器以政治介入教育的惡行再現。

（鄭麗君 / 立法委員）

課綱微調爭議與民主公民教育

林佳範

對於衝上街頭與高喊著部長下台的學生，已不是過去在校園中乖乖被規訓的一群；他們爭取的不再只是他們個人切身的髮禁解除，而是指責向來被認為是大人與專業的課綱，怎麼可以違背民主的程序與進行如此的意識形態操弄。我們向來不對等與講求「和諧」的教育關係，已被迫要改變。



我們向來視學生為不成熟的個體，因此學生站出來抗爭，往往不被當一回事、甚至質疑其被操控。

去年（2014）由公民與歷史老師上街頭，今年由高中生接棒，針對國民黨政府的黑箱課綱微調，進行嚴厲的抗議，不僅包圍教育部、衝進部長辦公室、甚至有學生以自殺明志，一波又一波的抗爭，不斷地將抗爭的情勢提高，大大地撼動向來保守的教育體制。先不論其訴求最後是否達成，對於衝上街頭與高喊著部長下台的學生，已不是過去在校園中乖乖被規訓的一群；他們爭取的不再只是他們個人切身的髮禁解除，而是指責向來被認為是大人與專業的課綱，怎麼可以違背民主的程序與進行如此的意識形態操弄；當他們大聲說出：「不要被洗腦」時，他們所質疑者，已不限於課綱本身，甚至是學校的管理與老師的教學，我們在校園內的大人，我們是怎麼在處理教育，中立性如何可能?他們會乖乖地在司令台下聽校長邀請的知名人士侃侃而談政治嗎?他們能夠聽得下老師在課堂上對於政治大放厥詞嗎?我們向來不對等與講求「和諧」的教育關係，已被迫要改變。本文將從民主公民教育的角度，來探究其對教育關係的衝擊與因應之道。

不要把我當小孩

首先，承認學生的獨立性與主體性。我們向來視學生為不成熟的個體，因此學生站出來抗爭，往往不被當一回事、甚至質疑

其被操控，不難發現在這次的抗爭中，仍有許多的大人仍持這種想法。然而，學生的表現，不得不讓人佩服，他們引用法條與提出證據，敘事論理有條不紊，往往讓教育部官員瞠目結舌，不知如何回應，完全不輸民意代表對官員的質詢。以身殉道的林冠華，母親在閱讀完他的書寫後，公開地懺悔她對冠華的低估與誤解，當學校或媒體將其自殺導向壓力的問題，她希望大家不要再誤會或抹黑冠華，他不是脆弱的草莓經不起壓力，相反地，他是深思熟慮後的決定，他這種為信念而犧牲的舉動，更不是一般的大人所能做到。

從民主公民教育的角度，為促進其發展與成熟，更應承認學生的獨立性與主體性。如同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所強調，民主不僅是一個政治體制，更應在生活中的溝通與互動中實踐；從教育關係的角度而言，學生不是受教的客體而已，其更是教育互動過程的溝通主體；民主的公民教育，對於公共事務縱使其意見不成熟，更應鼓勵學生參與和表達，在互動中學習包容不同意見，並學習如何形成公共的意見、凝聚公共的意志、採取有效的公共行動。在這次的學生行動，不管是對內或對外之組織運作，都已遠超過一般校內所能提供的學習空間與機會；從學生的表現，更證實杜威所謂的「做中學」，其展現之成熟度，已遠超過沒參與的同齡學生，足見只要給其空間與機會，對其成長與學習是必要的。只有把他當大人，他才會成為大人；把他當小孩，他就永遠只是小孩。

不要怕政治

再者，政治是眾人之事，民主社會更應



民主的公民教育，對於公共事務縱使其意見不成熟，更應鼓勵學生參與和表達，學習如何形成公共的意見、採取有效的公共行動。



政治不應像過去，僅有少數的政治精英以家父長之姿態，來決定與你我相關之公共事務。

關心與參與。過去威權時代，人民被馴化為順民，僅被要求服從，而加上白色恐怖的威脅，為明哲保身，大人更要求學生僅要關注在自身的學業，不需理會政治。相反地，在民主社會的公民，被期待能與其他公民，共同地來參與公共事務之解決，實踐憲法上所謂「主權在民」。政治不應像過去，僅有少數的政治精英，以家父長之姿態，來決定與你我相關之公共事務；人民選出之公職人員，並非表示往後都要聽他們的，相反地，既為人民之代表，更應傾聽與蒐集民意，透過共同的審議，來形成公共的意見與意志。

課綱微調之爭議，更凸顯出在民主價值與意識形態多元的社會，所謂「課綱」本身之性質為何？其應如何形成？所謂「課綱微調」的爭議，即在於教育部的處理過程中，不僅組織上透過非體制內的「檢核小組」、程序上第一線教師之徵詢過程草率、課綱審議委員會有關課綱微調之必要性議決與決議之不清楚、審議委員名單不公告（已遭行政法院認定違法）、內容上以憲法為名掩飾特定政黨的意識形態（違背教育基本法第6條所揭櫫之教育中立原則）等等，遭受外界質疑其黑箱作業與威權復辟，與民主法治理念相違背。

在這次的爭議中，早在去年318太陽花學運前，不僅公民老師率先站在教育部前抗議，已是前所未有的光景，打破過去校園是最被馴化與管控的印象。顯然台灣的教育民主化，除體制上1998年所訂定教育基本法，將過去的「國家教育權」轉化為「國民教育權」，落實多元參與和分權的民主教育體制，已漸具雛型；公民教師秉持其專業，抗拒由上而下專斷的課綱微調，展現其獨立與自主性。不遑多讓地，今年高中學生透過全台之串聯，形成更大的改革力量，捍衛他們從小即接受的民主價值，一改過去只關心升學的草莓形象，更打破過去世代所殘存的白色恐怖陰影，直接參與政治。他們向大人們說，我們雖然法律上仍未有公民權，但無法限制我們關心與參與政治，我們仍然可以對公共事務發聲。我們已不是在教室裡聽公民課，而是在街頭上實踐民主公民的教育。

不要被洗腦

最後，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共同檢視



今年高中學生透過全台串聯，形成更大的改革力量，捍衛他們從小即接受的民主價值。

知識與真理的主張，不再享有其專有權。當學生說不要被「洗腦」時，教育就不再是老師將知識或真理「教」給學生，蓋你所教之「知識」或「真理」的正當性已被質疑，且背後的意識形態政治操作已被發現。以這次的課綱微調爭議而言，所謂「檢核小組」，假憲法之名來動課綱，反而激起更多質疑其正當性與反動的政治操弄，蓋所謂民主化的憲法，向來就不是過去所謂「法統」，曾用來正當化萬年國會與威權統治，被神聖化為內容僵固不容修正，甚至被用來凍結人權與民主的保障機制。且其背後的「一中」意識形態，與憲法中所謂「固有疆域」，大法官在釋字第328號解釋早就認定其為「政治問題」無法在憲法中被確認。操弄所謂「憲法一中」，僅凸顯這些「檢核小組」成員，仍停留在威權統治時期的憲法觀與政治觀，當然在民主社會每個人皆擁有其憲法觀點，但其並非僅是個人觀點的問題，當其將手伸進國家機器，假憲法之名以公民與歷史知識之姿，進行所謂「課綱微調」，其本身除僭越大法官之職權外，更將特定意識形態之手，伸進教育之領域，明顯違背教育基本法所確定之教育中立原則。

就民主公民教育而言，所謂「教育中立」原則，非謂我們不應該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相反地，如前所述政治乃眾人之事，民主社會更應培養學生成為能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之公民。然而，過去的威權統治之下，學生不被鼓勵關心和參與政治本身，即是深刻的政治操作，蓋其刻意地被養成為順民，且特定之意識形態被獨尊，和官方立場不同者，僅被視為異議者而被迫害，更無需所謂「教育中立」原則，教育本身即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之工具。因此，教育基本法第6條，特別強調不得為「特定」之政黨或宗教進行宣傳，非謂不得談宗教、政治、或政黨。在民主開放的教室，不管是宗教或政治或其他爭議性議題，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與立場，但擁有公權力之教師、學校、教育局處、教育部，需要小心不能為特定政黨或宗教進行宣傳，蓋此乃民主體制承認個人意見自由之包容表現，國家運作須保持中立，否則很難在民主與多元價值的社會中取的公信力與維持秩序。簡言之，面對真理與知識主張，教師或學校不再專有其特權，必須尊重學生仍得保有其不同的意見與主張之可能，採開放之態度與學生共同來追求，而非以教育與知識真理之名，上對下地要求學生無條件地接受。

綜言之，課綱微調的爭議，已不僅是一般的社會抗議，因學生的身分與所抗爭之教育議題本身，其已撼動基本的教育關係。以教育之名，傳統由上而下之意識型態灌輸之方式已被挑戰，不僅民主社會中，剛性課綱適不適合？教科書審查體制，有無違背憲法所保障之意見自由？教師的教學方式，如何才不會是洗腦等等？皆已浮上檯面被質疑與檢視。當老師與學生都走上街頭以後，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必須正視他們的聲音與主體性，在教育事務之處理上，納入他們的意見，實踐民主由下而上的公共意見與意志的形成，才是在落實教育基本法的國民教育權。希望在這次的課綱微調爭議，不僅是學生在實踐民主公民教育，特別是教育體制中的大人們，也是重要的民主公民教育的一課。



「教育中立」非謂我們不應該教政治或意識形態，相反地，民主社會更應培養學生成為能關心與參與公共事務之公民。



面對真理與知識主張，教師或學校不再專有其特權，必須尊重學生仍得保有其不同的意見與主張之可能。

（林佳範／台灣人權促進會前會長與現任執委、台灣師大公領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教育部人權教育輔導群召集人）

憲改就這樣玩完了?!

2015年前半年備受各界高度關注的憲法修改議論，因立法院6月16日朝野黨團協商未果，於會期最後一天未送出任何修憲案，為明年大選合併舉行修憲複決打上了休止符。值得思索的疑問是：憲改，就這樣玩完了嗎？

羅承宗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人民權利的保障書。法國人權宣言第16條揭櫫「權利之保障未臻確實，權力分立制度未予釐定之社會，不得謂為有憲法之社會」，明確指出近代意義憲法應有的內涵。然而從憲法學理而言，中華民國憲法從頭到尾，無論在人權保障與權力分立制度方面，病徵非常複雜，造成憲政制度紊亂。至於1991年以後，以增修條文方式處理修憲，結果是約有1/4條文凍結且無恢復可能，但卻仍保留於本文，導致整部憲法前後不協調。尤其歷來憲改的焦點往往偏重在政府體制的修改調整，以滿足短期政治發展需要。不但未對政府體制問題進行通盤的檢討與修正，整部憲法的完整性與合宜性也無法建立，並衍生出許多憲政運作上的扞格與僵局。由此觀之，修憲有其迫切的時代必要。

2015年前半年備受各界高度關注的憲法修改議論，因立法院6月16日朝野黨團協商未果，於會期最後一天未送出任何修憲案，為明年大選合併舉行修憲複決打上了休止符。值得思索的疑問是：憲改，就這樣玩完了嗎？

2016年憲改破局主因：有立院主場優勢的國民黨

此次憲改破局，儘管各界譴責不斷，但從現行立法院政黨席次與憲法修憲門檻剖析，結局並不令人意外。詳言之，中國國民黨一黨掌握行政與立法兩權，這是直到2016年1月前都不會改變的完全執政結構。姑且以2014年12月作為分水嶺觀察，在此時點之前，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屢次主張「行憲重於修憲」，對任何修憲案大抵興趣缺缺（註1）。這個立場反應在立委提案數量與來源上，本屆立法院在此時點前僅有7筆修憲提案，而且除該黨盧秀燕委員與若干民進黨委員罕見連署提出的憲法130修正案（降低投票門檻）外，其餘為民進黨立委提案。附帶一提者，在此三年多期間內，由於立法院組成修憲委員會遙遙無期，以致相關提案無法排入議程。若干民進黨立委「明知



歷來憲改的焦點往往偏重在政府體制的調整，滿足短期政治發展需要，未對政府體制問題進行通盤的檢討。

不可為而為之」提出修憲案，除彰顯立委本身對憲法改革的立場與想像外，亦有使相關提案正式留存立法院歷史記錄的意義。

2014年12月後，以九合一大選中國國民黨慘敗，主席馬英九倉皇去職，由朱立倫於今年1月接任黨主席為契機。一面宣布不參選明年總統選舉，另一面則將內閣制列為憲改清單首要目標，顯然與馬英九悍然排拒修憲的立場迥異。從2014年12月底由賴士葆委員連署提出的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修正案（恢復閣揆同意權）起算，至憲改破局前，國、民兩黨共計提出36個修憲案。立法院修憲委員會亦於今年3月底開始運作，正式啟動憲改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民黨的憲改清單以恢復閣揆同意權為中心，並非基什麼崇高的政治信仰與憲政學理，只是出於自利的政治盤算。更淺白的說，在朱立倫棄選總統前提下，中國國民黨意圖藉由內閣制或準內閣制以削弱總統權限，使得黨產數百億、容易在立法院取得多數席次的該黨，於2016年政權輪替後繼續成為國政的實質控制者。

至於堅持與18歲公民權與不在籍投票配套入憲的主張，不僅欠缺公法學理支持（註2），更充斥選舉詭詐。誠如論者指出，一旦不在籍投票付諸實行，百萬台商眷屬投票部隊只要在法定期間內將投票所移至鄰近中國的金門、馬祖行使，本來只有少量、零散、坐飛機的空降傘兵，將變成由特定人士帶隊、龐大、搭船登陸的陸戰兵團。由於這些台商前往的投開票所勢必侷限於數個特定區域，且與當地選民不成比例。於是這些返鄉投票台商的政治選擇立刻無所遁形，未免事後遭受不利益對待，屆時只有配合層峰指示投票餘地。

面對上述中國國民黨充滿濃烈政治算計的修憲戰略，民進黨雖在立法院居於少數席次，不具主場優勢。諷刺的是拜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憲法修正案應由出席立委3/4決議的高門檻之賜，民進黨雖無開啟修憲程序及主導修憲方向的積極實力，卻被賦予否決修憲提案的消極實力。除非朝野高度合作，否



中國國民黨的憲改清單以恢復閣揆同意權為中心，只是出於朱立倫棄選總統前提下，於2016年政權輪替後，以此削弱總統權限的政治盤算。

則不足以成事。若中國國民黨對已具相當社會共識的修憲提案，如降低公民權、人權清單充實、降低修憲門檻、降低不分區席次分配門檻等部分積極推動，在輿論壓力下，民進黨無刻意刁難的餘地。反之，當中國國民黨修憲提案充滿政治算計、與民間期待落差過大時，民進黨亦無坐視不理的可能。

2015年初，朱立倫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啟動了寶貴的憲政時刻。朱主席本可藉此契機，開放心胸聆聽民間憲改團體種種訴求，並轉而納為己用。重新與人民站在一起，作為2014年地方大選慘敗後振作的新契機。讓人惋惜的是，中國國民黨糟蹋了如此寶貴機會。承前所述，層峰定調的憲改清單重心為恢復閣揆同意權與不在籍投票入憲，箇中政治算計並不高明，一望即知，大抵以政治權力延續為著眼點，與民間憲改團體的憲改訴求南轅北轍，大失民心。憲改破局後，民間憲改團體旋即齊聚中國國民黨總部前集會抗議擲蛋，即可得證。有始無終，讓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聲望繼續下跌，此役可謂朱主席領軍打下的第一場敗仗。

總之，2016年憲改成敗最關鍵的力量既非在野黨，亦非公民憲改團體，而是取決於掌握立法院主場優勢的中國國民黨。而堅持綁票式修憲的中國國民黨，無疑是2016年憲改破局的罪魁禍首（註3）。

下一個憲改契機：明年過後，誰有立院主場優勢？

翻開台灣的政治行事曆，過了2016年1月總統與立委大選，緊接著2018年11月底的地方大選又轉瞬屆至。將視野拉回「憲改就這樣玩完了嗎？」這個提問上。解答為何，端視2016年第9屆立法院政黨勢力消長而定，基本上與那位總統候選人贏得選舉並無直接關連。如前所述，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設計下，立法院是啟動修憲程序唯一的發動機，任何琳瑯滿目的憲改課題討論，最終依舊要回到立法院進行政治動員與攻防。只要立法院1/4席次杯葛修憲提案，就沒有交付人民投票複決的可能。



中國國民黨本可藉此憲改契機，開放心胸聆聽憲改團體種種訴求，轉而納為己用，重新與人民站在一起。

教育乃百年大計，憲改何嘗不然？倘若台灣人民對台灣憲政改革還抱有一絲期盼，那麼當前應努力的短期目標，不在打造恢弘的新憲改藍圖，不在總統制與內閣制的難題抉擇，而是思考如何淘汰扼殺憲改時刻的不良政黨與政客，使真能代表庶民意志、進步思維與台灣本位的新民意順利入主立法院，讓中央代議政治煥然一新。唯有促使信仰台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進步力量在立法院席次極大化，主客場逆轉，2018年憲改契機才會真正到來。

註1：如2014年6月3日馬英九主席曾指出，憲法是根本大法、首重安定性，從國發會民調也已看出主流民意並不希望修憲，希望民進黨不要誤解民意云云。

註2：受到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推薦參與修憲公聽會的公法學者廖元豪教授，也明確提出不在籍投票「不需要修憲」、「不修憲也能作，立法即可」等觀點。筆者亦受邀參與此次公聽會，緊接廖元豪教授之後發言。

註3：亦有學者持不同觀點，將修憲破局歸咎朝野兩黨權謀算計與利益交換。

（羅承宗 / 南臺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倘若台灣人民對憲改還抱有一絲期盼，那麼當前應努力的目標，是思考如何淘汰扼殺憲改時刻的不良政黨與政客。



點燃全面憲改的新火

今年修憲未過關，固然是一項挫敗，但這一波憲改運動不能說已經失敗。從九合一選後、修憲破局前後，憲改議題在主流媒體上的曝光度，以及這半年間不時出現的社會擾動可以看出，社會對於「台灣需要憲政改革」的意識，其實是穩定存在的。

徐偉群

2016年6月16日，也就是立法院今年上半年會期的最後一天，由立法院修憲委員會通過的三十三項修憲案，沒有一項排進立法院院會議程。在國民黨「不綁閣揆同意權與不在籍投票就不讓過關」的綁架操作下，憲改團體努力想促成的「第一階段修憲」，正式宣告破局。

今年修憲未過關，固然是一項挫敗，但這一波憲改運動不能說已經失敗。

從318佔領國會行動期間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開始，這波憲改運動，注定是一次由「社會力」捲動「政治力」的過程。「壯大社會力」，和「捲動政治力」都不是容易的工作。尤其是，隨著佔領行動的結束，社會危機感的消褪，對憲改能不能成局是最嚴酷的考驗。有評論者因此在憲改運動的初期就對表示極度悲觀。

不過，從九合一選後、修憲破局前後，憲改議題在主流媒體上的曝光度，以及這半年間不時出現的社會擾動可以看出，社會對於「台灣需要憲政改革」的意識，其實是穩定存在的，並沒有真的那麼悲觀。

「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在去年九合一大選後，抓住政治變局，提出「二階段憲改路線圖」，這裡面已經估計了各種憲政改革的困難。踩住2018第二階段「全面憲改」的目標，2016的第一階段憲改就是要讓第二階段「由下而上全面憲改」「提前起飛」。但是，我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亦即，在第一階段修憲最終未過的情況下，我們至少要取得第二階段的「預約」。

第一階段憲改留下政治火種

過去400多個日子裡，國民黨的杯葛，國會通過或者未通過修憲案，始終都在憲改團體的計算範圍內。在5月2日民間團體合力舉辦的「2016台灣憲改藍圖會議」之前，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即已經過多次的訴求與政治遊說，因此，我們得以在會議當天取得民進黨蔡英文主席與部分立委，以及社民黨、綠黨召集人與部份參選人等簽署的「全面憲改承諾書」。承諾書的內容，除今年修憲之外，





從318佔領國會行動期間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訴求開始，這波憲改運動注定是由「社會力」捲動「政治力」的過程。

也包含「確立公民普遍參與的管道，促成由下而上的全面憲政改革，並於2018年底或之前交付公民複決」。不僅如此，蔡英文主席也在憲改破局之後公開發表四點聲明，承諾「未來無論是否重返執政，民進黨都會貫徹承諾，持續推動憲政改革」。

「全面憲改承諾書」與蔡主席的聲明稿，就是第二階段憲改的政治火種。

有人認為政治人物的承諾不可靠。這個說法並不全然正確。民進黨固然是一個快速庸俗化的政黨，固然也總是「自我利益計算」，但是，至少到今天，民進黨無論是取得最大在野黨的位置，或眼見要再度取得執政黨的位置，它的正當性仍然要仰賴社會力的支持。民進黨與它的領導者，也許想掙脫這種束縛，有成為另一個國民黨的意圖，但在短期內，它還做不到。而這，就是憲改運動者在接下來的政治新局進行政治施壓的基礎。事實上，蔡主席在憲改破局後的聲明稿本身，就是民間團體政治施壓下的產物。這是為什麼第一階段憲改，並非真的一事無成。「全面憲改承諾書」與蔡主席的聲明稿，是我們留下的第二階段憲改的「預約」。

廣泛喚起新憲意識

在憲改運動過程中，憲改團體不斷被問到的問題是，「憲改在政治上如何可能」、「政黨為何要為憲改訴求買單」。這確實是嚴肅的問題，憲改團體從第一次集結開始，就不斷在思考，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國民黨打從心底抗拒憲改，而民進黨則抱持觀望與被動心態（除了少數具有理想性的立委之外）。民間團體最初半年所做的，是致力舉辦研討會、記者會，在北、



第一階段憲改，並非一事無成，「全面憲改承諾書」與蔡英文主席的聲明稿，是我們留下的第二階段憲改的「預約」。

中、南、東各地舉辦「草根論壇」。這個時期，「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與「憲政改革」議題幾乎得不到主流媒體的關注，也得不到國、民兩黨的理睬。

然而，在去年底九合一大選國民黨大敗之後，國、民兩黨主席第一時間的對外回應，卻是「支持憲政改革」、「支持民間團體『由下而上／全面憲改』的主張」。憲改團體利用這個政治機會，主動為「由下而上／全面憲改」設定「二階段憲改路線圖」，後來也都引致各政黨的回應。

為什麼看來無人理睬的訴求，一夕間又得到兩黨的回應？一個合理的回答是，憲政改革訴求的正當性，以及九合一大選證實了，自318解放出來的政治改革意識並沒有真的冷卻，這兩個因素，迫使兩黨要接下憲改訴求。

這告訴我們，憲改在政治上的可能，固然需要某些契機與技術安排，但講到最後，關鍵仍在於社會力是否足夠強大。社會的憲改動機愈強大，憲改的政治場景就愈可能想像。

因此，616憲改破局的街頭場景，網路上的熱議，以及主流媒體迴避不了的報導，顯示憲改團體所做的「草根論壇」、「憲改藍圖會議」、研討會、記者會這些看似狗吠火車的行動，並非全無用處。它還是讓社會的改革意識繼續保溫，社會力處於可集結的狀態。

下一階段憲改最重要的工作，也在於設法更廣泛地喚起社會對憲政改革必要性，形成足夠鉅大的，讓下一任執政者，準備進入新國會的參政者感到壓力的「社會力」。

「由下而上」入法，點燃憲改新火

憲改團體接下來必須做的，就是以各種形式的社會對話，讓更多的公民認識到，自己是可以改變國家政治的一份力量，自己是促成憲政改革的一個主體。

關於「新憲必要性」，我們的社會對話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回顧我們身受的政治痛苦，從318事件，從我們記憶中仍然清晰的土地掠奪、世代掠奪、經濟掠奪、主權掠奪、兩岸政商權貴壟斷國家政治、地方政治腐敗等等，去追溯它們的體制成因，去揭示其中與「憲政」的關係。一是，從一般人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的疏離，從對於「課綱不能違憲」的荒謬感，從其他國家「人民寫憲法」的經驗，去發覺我們「有一部屬於自己的憲法」的需要。

重要的是，對話的形式需要多元。「審議式民主」的公民參與，因為318期間的街頭審服貿而被許多社群注意到。憲改團體在第一階段致力推動的「草根論壇」正是這種形式。不過，「憲政改革」議題對於公民的普遍參與而言，有一定的知識門檻。因此，在下一階段凝聚社會力的過程，「導讀型」的座談會、演講、研習活動，與「審議型」的「草根論壇」或其他審議式活動，需要多管齊下。

「由下而上」在憲改運動裡，既是捲動政治力的「工具」，又是憲改運動的「目



下一階段憲改最重要的工作，在於設法喚起社會對憲改必要性，形成讓下一任執政者感到壓力的「社會力」。



憲改議題對於公民的普遍參與而言，有一定的知識門檻。因此在凝聚社會力的過程，「導讀型」研習活動，與「審議型」審議式活動，需要多管齊下。



1996年南非提出公民新憲參與計劃，至全國舉辦「教育型」與「諮詢型」公民會議，以蒐集到的250萬筆提案做為參考資訊，最後擬訂憲法草案。

的」。或者應該反過來說。從最根本的理念而言，人民本來就是國家的主人，是建構憲法的主體，「由下而上」決定憲法該寫什麼，是「應然」之理。而如今，這個「應然」，也並不僅停留在理念的層次，在民主政治中，也已經某種程度的實踐為「實然」。

「由下而上」的寫自己的憲法，最具體的憲政意義，就是「憲政」成為人們生活的一個部份。這個憲政文化的自我塑造，對一個國家憲政民主的健全化具有真實而深刻的意義。在今天台灣的憲改運動過程中，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參考事實。

1996年南非新憲，由兩院國會議員組成的「憲政會議」（Constitution Assembly），提出公民參與計劃（public participation program）。根據這個計劃，憲政會議必須動用人力物力，至全國各村、鎮、學校去舉辦「教育型」與「諮詢型」公民會議。透過「教育型」會議，讓各地人們得到憲政知識，透過「諮詢型」會議，蒐集公民的憲法提案。憲政會議以蒐集到的250萬筆提案做為參考資訊，最後擬具憲法草案。

此外，更早的1982加拿大「自由與權利憲章」，更近期的加拿大卑詩省（英屬哥倫比亞省）「選制改革公民會議」，以及冰島「公眾委託憲改」（crowdsourcing constitution）都是公民參與憲法塑造（constitution building）的例子。

憲改團體這次訴求憲改的核心就是「由下而上／全面憲改」。在第一階段裡，我們



憲政時刻未必仰賴於偶然，憲政時刻也是可以打造的，「全面憲改承諾書」與蔡主席的聲明稿，就是第一階段憲改留下的政治火種。

除了以自己的力量推動「草根論壇」，也向政黨和國會提出「國會負責建構『由下而上』的制度」的主張，要求由國家資源來承擔這項責任。

面對第二階段憲改，「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將要推動「由下而上」憲改程序立法。「由下而上入法」，一方面是落實「由下而上」訴求，使公民參與程序與現行修憲程序聯結的方式；另方面，這也是再一次在社會，以及在政治上啟動憲改議題的行動策略。今年下半年國會會期，也是2016大選前夕，「由下而上憲改程序入法」正可用來檢視總統與立委參選人對憲改態度。我們要再一次地凝聚社會力來捲 動憲改的政治力。

民進黨卸不下的責任

第二階段「由下而上／全面憲改」的時間表，對準2018。可以預期的是，這個時間將是不同於現在的政治局面。

民進黨在第一階段憲改時期的態度，和318佔領國會前夕一樣，是處於一種缺乏理想性，缺乏開創國家新政視野的觀望狀態。318時期，它淪為為佔領者看門的角色其來有自，也是他們贖罪的方式。在第一階段憲改期間，民進黨公開支持憲改訴求的種種聲明，實際上也都是憲改團體一再施予壓力而生的。它的領導階層以及整個黨，並沒有推動憲改的使命感與方向感。

這是為什麼，在第一階段修憲破局後，蔡主席第一時間的公開聲明雖然是承諾繼續推動憲改，但進入拼選舉的階段後，黨中央釋出的訊息卻又是「憲政時刻已過」。

民進黨實在應該記得，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的那一刻，蔡主席謙卑地認知到，那不是民進黨的勝利，不是民進黨得到了更多的肯定。民進黨也應該要認知，在今天，再怎麼樣想要庸俗化，想要自我利益計算，都無法逃脫歷史的檢視。那些曾經支持過民進黨的理想性、社會力，以及從新世代滋長出的理想性與公民力量，並不會容任民進黨逃脫它對國家的義務。

就如同蘇彥圖教授所言，「憲政時刻」未必只仰賴於偶然，憲政時刻也是可以打造的。2016的新政治，就是再一次打造憲政時刻的契機。因此，從現在開始，憲改運動的政治壓力，就要更大幅度地對民進黨。前面說過，「全面憲改承諾書」與蔡主席的聲明稿，就是第一階段憲改留下的政治火種，「由上而下入法」就是點燃憲改新火的序曲。民進黨及其領導人一旦執政，就再也沒有把憲改失敗的責任推給國民黨，再也沒有說「憲政時刻已過」的餘地了。

（徐偉群／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委、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中國經濟的兩個盲點與兩個陷阱

人們不了解中共，是因為中國像迷宮，言人人殊。有人乾脆就說：「你自以為你所知道的中國，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Minxin Pei, Foreign Policy, Aug. 29, 2012），它的副標題是：「當我們著迷它的崛起時，是否正該擔心它的墜落？」（Are we obsessing about its rise when w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its fall?），我想講的正是如此。

張清溪

太陽花學運讓我們看到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對中共無所畏懼。但也有人說他們是拒絕中共，是恐共。其實，真正恐共的人是不敢站出來對中共說「不」的。這年頭很多人不是親共就是媚共，很少人反共。我認為這是對中共不了解。如果真的了解中共，不反共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你去跟他做生意，從他那裡賺錢，你都會反共。真正的關鍵是，什麼是中共的真面目？

當然，中共不等於中國，反共不等於反中國。但今天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什麼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所以我們談中國、談中國經濟，都離不開中共。人們不了解中共，是因為中國像迷宮，言人人殊。有人乾脆就說：「你自以為你所知道的中國，都是錯的。」（"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China is wrong!" Minxin Pei, Foreign Policy, Aug. 29, 2012），它的副標題是：「當我們著迷它的崛起時，是否正該擔心它的墜落？」（Are we obsessing about its rise when w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its fall?）。我想講的正是如此。

舉例來說，最近中國經濟出現泡沫破裂現象。中國股市泡沫已經破裂幾次，這次是房地產泡沫。說這個泡沫要破了，已經有一段時間，而且現在做出泡沫破裂預測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泡沫肯定是要破的，只是時間問題，愈晚破裂問題愈大，而且破裂會影響到整個金融。香港首富李嘉誠最近賣光了他在中國的房地產，更增加這個急迫性。但要了解中國，我們還是要談它的基本面。



中共根本的問題，是它先後落入兩個陷阱：改革開放前陷在「政府經營企業」，之後則掉到「用企業方式管理政府」。

許多人對中國有兩個盲點：一是認為中共已經改了；一是以為中國很強大。這都是徹底的錯誤。我在說明這個錯誤時，同時也要提出中共根本的問題，是它先後落入兩個陷阱：一是1978改革開放前陷在「政府經營企業」（簡稱政府企業）陷阱，之後則掉到另一個叫做「用企業方式管理政府」（簡稱企業政府）的陷阱。

盲點一：誤以為中共已從良

說中共沒有改，在政治上大家不會有疑問，因為在所謂的「改革開放」後，它的憲法沒改、統治者也還是那個獨裁中共。但經濟若沒改，它怎麼可能發展呢？建設、外匯存底、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不都令人刮目相看？是的，表面上有，但基本上沒改。所謂基本，就是經濟制度。

中共搞共產經濟最凶的時候，每個人的生產與消費都由黨國負責，所有商店全部國營，大家吃大鍋飯。改革開放後，中共把管人民日常生活的手放開，大家要自己去找工作、自己消費。就這樣，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出來了，經濟就發展了。但是，它的經濟制



日常生活國家不管你，但它要管時可以隨時管你。2007年在北京的新光三越被合資的華聯強占，新光少東吳昕達遭到扣留驚魂五天。



蘇聯當年就是因為耗用二分之一的國力在軍事上，導致它最終崩解。中共現在對內維持穩定費用甚至超過國防。

度並沒有改變。

經濟制度決定於兩個變數：私有財產權與經濟決策權（包括生產與消費）。如果沒有私有財產權，日常生活又由國家管控，就是共產主義經濟；如果有私有財產權，日常生活是每個人自己決定，就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財產權最主要的就是土地產權。今日中國，土地在城鎮是國有，在農村是集體所有；人們只有一定期間的使用權，沒有任何人有完整的所有權（包括使用、收益與處分權）。

日常生活國家不管你了，但它要管時，可以隨時管你。房子被強拆、農地被強賣，引發無數的抗爭。許多台商在中國蒙難，新光三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2007年8月在北京的新光三越被合資的華聯強占，新光少東吳昕達被以貪污受賄、洩漏國家重大商業機密為由扣留，驚魂五天；商業經營權一夕變色，甚至連身家性命都不保。你說你有經濟決策權嗎？平時有，但說沒有就沒有了。

中共本質是謊言與暴力，這可是一點都沒有變的，只是更加隱蔽與邪惡。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受盡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販售圖利，自1999年迄今未改。

盲點二：誤以為中國很強大

很多人認為中國很強大。當然它有讓人迷惑的地方，如硬體建設、國防軍事、政府財力、世界影響等等，都顯得不可一世。但這些項目，都可以看出許多問題，如豆腐渣工程、鬼城。馬航事件中，中共的衛星、海巡船蛟龍號等一再笑話，曝露軍力的破綻等。

中共用各種手段對人民課稅，搜括民脂民膏。2009年《富比士》（Forbes）公布稅負痛苦指數，中國排名世界第二。之後它連年稅收成長率超過國民所得成長率。中共政府手中確實很有錢，所以可以在世界各地胡作非為。但這表示中國很強大嗎？迄今，中國的科技、國民所得、軍力仍遠不如當年的蘇聯。蘇聯當年就是因為耗用二分之一的國力在軍事上，導致它最終崩解。中共現在對內維持穩定（維穩）費用甚至超過國防，它還算強大嗎？

為什麼維穩費用超過國防？因為國內太不平靜了。以2012年10月召開的十八大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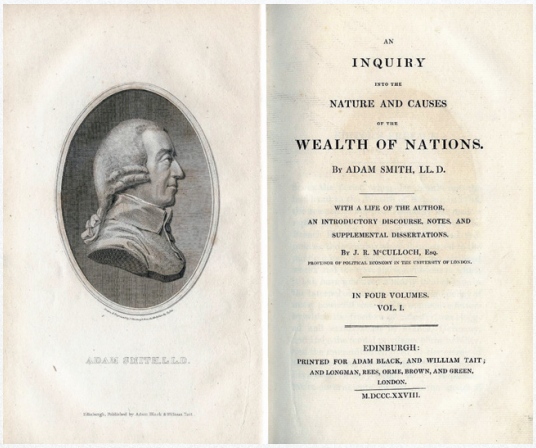
例：這個第18次（每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戒備到什麼程度？買菜刀、玩具飛機都要實名登記（有的商店甚至把所有刀具類全部下架）、計程車車窗搖桿拔掉（怕有人散發傳單）。當然，封鎖網路、抓捕訪民、監控異議人士等這些都不在話下。街道上布滿了警察與紅袖章的環衛隊伍，北京武警誓死保衛十八大安全。還有一個所謂「護城河工程」，包含三道防線：除一、二道北京地區、河北地區外，第三道包括天津、內蒙、山西、河南、山東、遼寧等3,900公里環省界，要「築牢首都安全穩定屏障」。

這樣把人民當成敵人防衛的國家、天天內戰的國家、維穩經費比國防經費更大的國家，開個會都這麼末日驚恐、杯弓蛇影、危機四伏的國家，它可能強大嗎？

前期：「政府企業」陷阱

中共統治中國產生極大的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上看，就是它掉落在兩個陷阱裡。早期它實行共產主義，把全國士農工商全部置於國家管制之下，全面由政府來主導。這種公營事業沒有效率，並非中國的特色，全世界皆然。1990年代全球性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浪潮，就是非共國家對這種事業反思的結果，而這些國家還只是部分公營事業而已。整個國家全面的「公營事業」（或稱「政府企業」），則讓蘇聯與東歐相繼崩潰。

或許有人會說，中共沒有崩潰啊，而且還老當益壯！不是。蘇聯、東歐、波蘭在1990年才相繼崩潰，中共早在1980年就撐不下去了，要不是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它就提早十年解體了。共產主義以政府經營企業，導致經濟山窮水盡，這已經是「蓋棺論定」了。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說：「沒有任何事務比企業與政府更矛盾。」意謂讓企業自由放任，才能發揮最大效能，但政府因為擁有強制性的公權力，所以要用憲法把它綁住，否則會變成一個恐怖的暴力政權。

後期：「企業政府」陷阱

「改革開放」後呢？我把「政府企業」當作一個陷阱，是因為政府經營企業是必敗無疑。這一點已經不必贅詞。但下一個陷阱是「企業政府」，意指用企業方式管理政府，這不是更有效率嗎？怎麼會是另一個陷阱呢？

在此必須做一個說明。「政府」與「企業」是兩個極端不同的東西。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裡說：「沒有任何兩個事務比企業與政府更矛盾。」（No two characters seem more inconsistent than those of trader and sovereign）意

謂企業要發揮最大效能，就是要讓它自由放任，自由競爭；也唯有民營企業，才會符合這個條件，才會發揮所謂的「市場機能」。但政府相反。政府因為擁有軍隊、警察、監獄等強制性的公權力，所以要先用憲法把它綁住，否則會變成一個恐怖的暴力政權。憲法有兩條乾坤索：基本人權與相互制衡的三權分立政府體制，就是用來限制政府那些合法的暴力。

亞當．斯密接著說：（大意是）用企業性格去管理政府（即企業政府）會是極壞的政府，以政府性格去經營企業（即政府企業）則會是極壞的企業。

1978年中共的「改革開放」，開放了人們對利潤的追求；因為沒有政治改革，它同時也開放政府對利潤的追求。憲法專家批評中共的憲法是「一部追求無限政府的綱領」。這個體制，沒有三權分立、沒有獨立的司法，不容有反對黨，媒體是黨的喉舌。在毫無節制下，政府比較像企業，但卻是有強制別人的企業。說它是「企業政府」是比較好聽的學術名詞，實際上，它就是一個「強盜集團」。

歷史已經見證了不論是中國、蘇聯、東歐、波蘭，全面的政府企業，都導致經濟崩潰。目前正在進行的，就是中共在世人眾目睽睽下，正在演繹著亞當．斯密對「企業政府」的洞見：用企業方式經營政府，將是極壞的政府，因為它幾乎能無所節制的胡作非為，以國家之力中飽私囊。

雖然有此認識，但還是沒想到中共在這個陷阱裡會是這麼邪惡與恐怖。這樣的強盜集團，司法如同幫派家規，因此各級政府貪污腐敗、不講誠信、對台灣威脅利誘，這都是必然的。它的反腐，只是口號與政府鬥爭。它甚至用國家機器對善良人民活體摘取器官，假借器官移植之名販售圖利，是人類從未有過的邪惡。這樣的天怒民怨，最終分崩離析，也就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

（張清溪 /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中共的憲法是一部追求無限政府的綱領，在毫無節制下，政府比較像企業，但卻是有強制別人的企業。

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芻議

邱義仁

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無法一蹴而成。既然認為「民主」是此一地區未來必然走上的道路，日本身為此一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正可提供此方面的協助。其責任不應只是聯合已經民主化的澳洲、印度和美國，更應向極待民主化的中國伸出援手。

中國是亞洲最強大的不民主國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軍費支出國，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日本是此一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五大軍費支出國（註1）。兩國之間不僅有著地緣戰略上的糾葛，更因歷史因素使得雙方夾雜太多民族情緒，為這個地區帶來不確定的未來。

為了日本能夠有個穩定的周邊國際環境，以便進一步發展自身的經濟，提昇自身國力，以下我們將從社會交流、經濟發展、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四個面向，提出我們的現階段日本的中國對策建議，供各界參考。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民族主義已取代共產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正當性的最大基礎。



民主主義雖然不可能使民族主義消失，卻能讓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以可控制的方式出現在日中關係之間，減少非理性因素的干擾。

一、社會交流面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民族主義已取代共產主義成為中共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最大基礎。中共中央在1994年8月通過推

動愛國教育以來，新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的確展現驚人的效果，而中共當局在可見的未來，也看不出有任何替代性的思想主張會出爐，因此，我們相信，中共仍將繼續以此一正當性來穩固其政權。

在這種趨勢之下，儘管日本已就歷史問題道歉了許多次（註2），中國仍不斷地在日、中歷史問題上，指責日本並未誠心反省。儘管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是僅次於美國，對外發動最多次戰爭的國家（註3），中國仍不斷地懷疑，日本的軍國主義是否將要復甦。這些指控雖然對日本並不公平，但日本政府內部不一致的言行，也必須負起責任。這些不一致的言行，使得日本不斷向國際社會所作的解釋，甚至抱怨自身所受的委屈（註4），其效果都被大打折扣。

在中國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的刺激下，日本人民對中國的好感度也不斷下降，從1993年的54％降到2012年的18％，而日本人民對中國的惡感與無感在2011年甚至已高達80％。長此以往，日本也會隨之產生日本民族主義，其衍生的情緒，不僅將使日本政府對國際社會的說明徒勞無用，更加昇高日、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換言之，以日本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對雙方及此一地區都有害而無益。

因此，我們建議；以民主主義取代民族主義！由日本國會撥款成立「民主基金會」，協助中國民主化。

民主主義並無法消弭民族主義於無形，南韓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民主主義可提供不同想法互相交流的機會，民主主義也可讓不同的想法以比較平和的方式呈現。也就是說，民主主義雖然不可能使民族主義消失，卻能讓民族主義所衍生的情緒，以較可控制的方式出現在日、中關係之間，減少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歷史上，我們也從來沒有看過二個民主國家兵戎相見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走到必須進行第三波改造工程的時刻了。中國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30幾年後，已實現了第二波的改造工程。現在的中國，不論是經濟轉型的需要（下節再述），或是成為國際間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需要，都必須進行第三波的民主化工程。

中國推動市場經濟伴隨而來的社會結構變化，必然產生一批城市中產階級，這些人既希望有穩定的環境供其進行交易，也產生新的權利意識，希望受到尊重。這些權利意識開啟了民主化的進程。歷史告訴我們，市場化並不必然「立即」帶來民主化，但歷史



中國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已實現了第二波改造工程，現在的中國，不論是經濟轉型，或是成為大國的需要，都必須進行第三波的民主化工程。



中共深受蘇聯瓦解的影響，堅定相信「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政策，認為民主化將帶給中國混亂，甚至使中共政權崩潰。

也告訴我們，市場化「之後」的民主浪潮是擋不住的（註5）。「市場化」與「民主化」在歷史發展的軌跡上，雖有時間差，卻有著緊密的相關性。

但中共領導層深受舊蘇聯瓦解的影響，一直堅定相信「穩定壓倒一切」的國家發展政策，認為民主化將帶給中國混亂，甚至使中共政權崩潰。因此，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不斷深化市場機能，另一方面在政治、社會層面上，卻不惜與歷史潮流相對抗，不斷強化控制的作為，即使成本愈來愈高也要強行壓制民主化的呼聲；即使再怎麼困難或不切實際，也要對網際網路加以檢查，企圖扼殺自由交流空間。

其實，四分之一世紀前，當時舊蘇聯瓦解的政經條件，與已改革開放30幾年後的現在中國完全不同。現在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遠遠優於舊蘇聯末期的俄國人民（註6）；經濟成長的勢頭，更與舊蘇聯末期近乎破產的經濟形勢不可同日而語。現在中國內部也不可能出現「葉爾欽效應」，薄熙來的遭遇就是最強而有力的例證。中國人民在辛苦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必定會珍惜目前擁有的成就，任何人企圖以民主化所帶來的自由，混亂現有的政經情勢，其實不勞中共當局費心，中國人民根本就不會盲目接受。中共領導層大可放下舊蘇聯瓦解所學得的「教訓」，放心地相信中國人民，相信「民主」。在逐步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國將會受到國際的推崇，中國才能重拾一百多年來喪失的民族自信心；也只有在這種自信中，中國才能冷靜地看待日、中以往的歷史，「和平發展」才有可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真正展開。民主化的中國也毋須再依賴有「兩面刃」效應的民族主義作為政權「正當性」的基礎。中國第三波的改造工程，就是建立在民主化的推行上。

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無法一蹴而成。日本作為此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正可提供此方面的協助。安倍總理在2012年11月提出「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主張時，他在最後說道：「……at the end of the day, Japan's diplomacy must always be rooted in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These universal values have guided Japan's postwar development. I firmly believe that, in 2013 and beyo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s future prosperity should rest on them as well.」既然認為「民主」是此一地區未來必然走上的道路，日本身為此一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其責任不應只是聯合已經民主化的澳洲、印度和美國，更應向極待民主化的中國伸出援手。

我們當然了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想要協助另一個不民主國家進行民主化的工程，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有「顛覆政權的陰謀」。因此，以美國為例，美國成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是由美國國會撥款推動成立的，並非美國行政部門，而且維持該基金會的獨立性。這樣性質的機構與工作，雖然仍會引起一些疑慮，但比起由行政部門直接設立機構來推動，疑慮總是會比較小一些。日本可以仿效美國的作法，由日本國會推動成立類似的「民主基金會」，協助中國進行民主化的工程，比方說，剛開始時先設立論壇，探討民主化與市場化的關係，釐清「民主化」是否為「市場化」的必要條件？或是充分條件？或是完全不相干？逐步地，去探討各種民主制度的運行情況；也可比較民主制度與不民主制度的優劣等等問題。一步一步地，去除許多不必要的誤解，使中國人民與領導層對民主化與民主制度有更深入的瞭解，終至完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邁入民主行列的偉大工程。

二、經濟發展面（註7）

中國經濟已進入轉型期。一方面，依賴加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因歐、美市場的萎縮使得成長減緩，又因其他新興國家的勞動力與土地價格比中國更具競爭力，使得過去二十多年雙位數成長的榮景不再；另一方面，依賴國內投資維持高速經濟成長，也因生產過剩，泡沫浮現，不得不回過頭來檢討此一發展策略。這些現象，都不是中國特有的，一些依賴出口推動經濟成長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台灣，都曾經歷過轉型的階段。

這三種模式並不必然互相排斥，只是有優先順序上的差別而已。

如果採行第一種模式，中國現在已經浮現的難題並沒解決。事實上，中國經濟成長依賴國內投資來拉動，其金額已佔了中國GDP的半數（註9），伴隨而來的低效率（浪費）（註10）以及生產過剩，甚至泡沫化的壓力，（中國房地產泡沫化的壓力最突出），至今仍揮之不去。

至於投資項目的選擇，與選定項目後的執行如何避免貪汙，更非市場機制能夠監督的。有權力決定投資項目或執行的人，並不必然會像「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理論所提到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註11）那樣，為了完成「個人的使命」，而去選擇投資報酬率比較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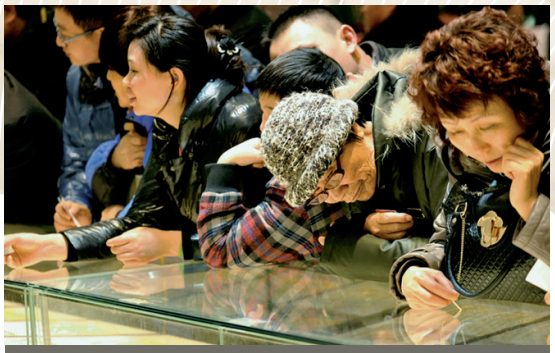
中國面對經濟轉型，有三種發展模式：繼續擴大國內的投資、擴大內需刺激國內消費、以技術升級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項目。因為基於相同的「理性選擇」理論，有權力的人也可能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尋租」（rent-seeking），而選擇低效率（浪費）的項目。同一個理論可以導出兩個南轅北轍的結果，這說明了，若要避免貪汙，不是仰仗有權者的「自我使命感」，而是有賴監督機制的建立。這就涉及上一節所談到的中國民主化。

民主體制並不保證必定沒有貪汙，但民主體制允許人民與其代表，以及媒體，多管道去監督有權力者的作為，使決策更加透明，也使貪汙的風險增高。不努力促成民主的話，選擇第一種發展模式的結果，將不僅無法讓全民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貧富差距繼續擴大；也會因投資效率不佳，讓推動經濟成長的成本增多，債台高築，終至無法負荷。

如果採行第二種模式，須先瞭解中國人民的消費力有多大。中國平均國民所得逐年提高，已達六千美元以上。中國人民的儲蓄率又極高（註12），照說，這些條件都有利於採行「以消費來刺激經濟成長」的政策。但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中國人民的家戶消費，到了2012年約佔中國GDP的36%，而且這個比例從2003年以來，一直下滑，即使期間溫家寶前總理曾推動中國人民購買家電的刺激性措施，也仍無法提升。

中國人民漸漸有錢，卻不太肯花錢，這使得採行第二種模式雖被高唱入雲，卻「知易行難」。很大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近乎闕如（註13）。中國人民不論



中國若要以消費來帶動經濟成長，就得面對民主化的過程中，比賦予公民政治權更深層的公民社會權的需求壓力。

上學、就醫、養老……，幾乎都須靠自己的儲蓄；一胎化政策更使中國人「養兒防老」的傳統，消失殆盡。

沒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先決條件，採行第二種模式將困難重重。政府推出再多的刺激消費政策，恐怕只是事倍功半罷了。但要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就必須正視「社會權」（social rights）的觀念（註14）。這又涉及中國的民主化。

一個民主化愈成熟的國家，對「社會權」的觀念愈重視，依此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更完備（註15）。中國若要以消費來帶動經濟成長，就得面對民主化的過程中，比賦予公民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更深層的公民社會權的需求壓力。

如果採行第三種模式，引進高、新技術，這是台灣、韓國正在走的道路。但要技術升級，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智慧財產受到保護，不僅可鼓勵發明、創新，也可增強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有利吸引外資，促進技術轉移。

然而中國的仿冒舉世聞名，根據BBC在2013年10月14日的報導，英國一位沒具名的商業領袖說：“We don't feel ready

yet to develop our 'crown jewels' IP in China"。一個旨在推動創新的智庫Nesta，在2013年的報告就指出，那些英國企業家擔心的，無疑是他們的智慧財產被偷走。而隨著中國本身的科技水平不斷提昇，國內、海外的情勢都顯示中國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已更加迫切，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也應更加重視。

中國若要建立保護智慧財產的法律體系，勢須引入私有財產的觀念、「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的觀念（註16）以及訓練執法的認真度。這樣的法律體系將衝擊現有的中國法律制度，進而影響行政部門的執法作為。這毋疑又會給中國民主化的要求注入新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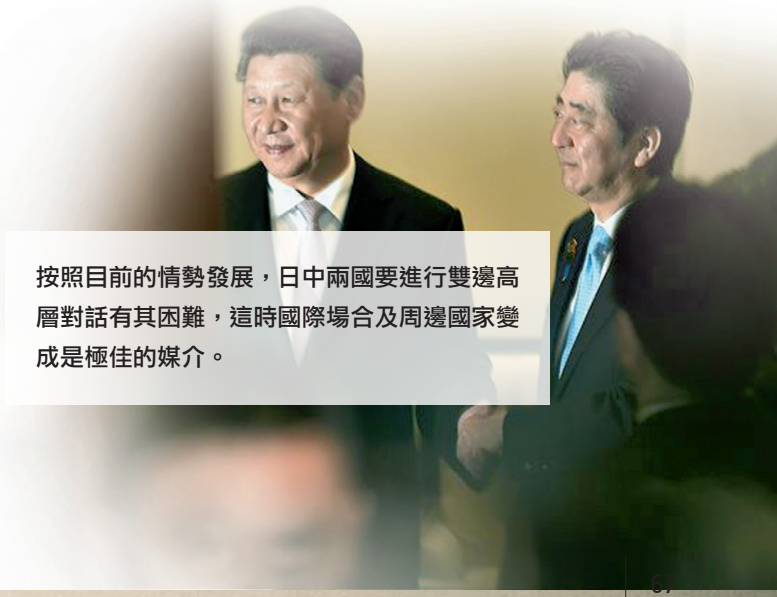
上述三種發展模式，不論中國採行哪一種，都將面對中國民主化的改造工程。誠如上一節所述，日本在中國面對民主化時，是可以提供協助的。「日本民主基金會」在協助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也可間接幫助日本企業比較放心地與中國進行技術合作或技術轉移，使中國經濟整型更順利，也使日本經濟發展得更好。

同時我們建議：1、日本可與歐美國家合作，共同促進中國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真正落實。2、日本的保險業可與台灣的相關業者合作，一起協助中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因為中國為了統一台灣，目前極可能讓台灣的壽險業者優先進入中國市場。台灣的這項特許優勢，加上日本業者在商品設計、組織與人員訓練以及資金運用方面的長處，將能為日、中、台三方的服務產業帶來榮景。

三、政治外交面

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日、中兩國要進行雙邊高層對話似乎有其困難，這時，國際場合及周邊國家變成是極佳的媒介。因此，日本除了參與國際組織的活動，緊密與美國結盟之外，加強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東協諸國的合作，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為，一方面東協是日、中之間的橋梁；另一方面，東協也是日中關係緊張的緩衝，中國若對日本採取過激的言行，徒增東協對中國的疑慮而已。

這並不是說，安倍總理提倡的「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不具對中國的戰略意義，而是說，強化日本與東協的雙邊關係，其作用並不完全與「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相同。東協正處於日本在南海海運線上必經之地，該海運線是日本極重要的經濟、能源與生存所繫之航運線，東協這樣的地緣優勢，不是澳



按照目前的情勢發展，日中兩國要進行雙邊高層對話有其困難，這時國際場合及周邊國家變成是極佳的媒介。

洲與印度可填補的。況且，東協經過多年的磨合，東協做為一個整體的意識逐漸強化，作為一個整體的雛形也漸浮現，日本不能再只選擇東協其中幾個國家來強化關係而已。如果我們看看中國對東協的態度，東協做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考量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中國總理李克強在2013年10月9日第16次中國與東協領導人的會議上表示，中國把東協視為北京與鄰國外交的一個首要目標，中國願意與東協簽署一項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APEC的PEC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會議上，明白表達支持東協整體的基礎建設。

事實上過去十幾年，日本並非沒有對東協下過功夫。日本透過ODA，重點援助或貸款給越南、菲律賓和印尼，其他像泰國、馬來西亞、Laos等國也有日本ODA的蹤跡。這些援助或貸款，有軟體方面的投入，如：人力資源的培訓，消除貧窮的計劃等；也有硬體方面的建設，如：電廠、水廠、公路、橋樑、機場的興建等。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日本對東協ODA的工作，必須進行整合與提昇。

據估計，亞洲未來十年需要的基礎建設約為八兆美元。由於東協經濟逐漸成長，基礎建設的需求愈來愈殷切，雖然這些國家一時無法支付全數經費，但也漸具部分能力來負擔基礎建設，透過貸款，這些國家能夠逐年償還。日本ODA無法應付這麼多的經費需求，而日本民間企業遠赴異邦進行基礎建設，固然有利可圖，但投資風險卻使他們顧慮頗多，此時，日本ODA若能給予幫忙，或協調JICA（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Finance by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提供貸款擔保，相信既能帶給日本民間企業利潤，促進日本經濟成長；又能協助東協基礎建設，強化日本與東協的關係，間接緩衝日、中之間直接對立的緊張關係。

此外，日本對能源與礦產的需求極大，而東協潛藏這些資源頗為豐富。日本是世界上進口天然氣最多的國家，日本從東協進口的數量，幾乎已佔日本進口量的40%。而緬甸的儲藏量，極可能比目前所已知的還要多。東協的石油儲藏量，若照目前的開採效率，據估計還可開採1300年左右（註17），換言之，開採及生產技術的精進，仍有很大的空間。這是雙方進一步緊密合作的另一個領域。

當然，不論是基礎建設的需求，或是能源與礦產的潛藏能量，這些訊息必須提供給日本民間企業，企業才能進行投資與否的評估，也才能產生興趣。而這些訊息的收集與提供，由日本駐東協各國的外館負起這個責任，是最為適當的。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1、將這些工作提昇至新設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來整合。2、責成日本駐東協各國的外館，將收集有關基礎建設與潛在能源和礦產的資訊，列為重點工作。JICA則負責將這些訊息傳達給日本企業界。3、加強日本ODA、JICA



中國含有「先制攻擊」的防禦觀，就是中國為了自衛，會早一步攻擊對方，這樣的思維，加上軍費支出增加，自然使周邊國家倍感威脅。

及日本駐東協各國外館的聯繫，定期舉行會報。

四、軍事安全面

日、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都各自有其軍事力量做後盾。雙方雖都宣稱不從事軍備競賽，但因中國的防禦觀念包含有「先制攻擊」（Preemptive action）的作法，也就是說，中國為了自我防衛，會早先一步攻擊對方，以免自己受傷害。這樣的思維，加上中國自江澤民主政以來，軍費支出每年以兩位數的百分比持續增加，自然會使周邊國家倍感威脅。日本安倍總理在2013年元月宣佈，新年度預算將增加日本軍費支出約四億餘美元，也就不足為奇。

日本的軍備，主要購自美國，少部分則是自製。面對中國的壓力，向美國購置軍事裝備的需求將會不斷升高，這對日本的國家預算可能產生排擠作用，或可能必須增加預算金額，而這兩種可能性，都對正在復甦的日本經濟及國家債務，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再說，日本對先進科技的掌握並不差（註18），自製軍事設備也有助於日本的經濟成長（註19）。因此，自製軍事設備，降低軍費支出，變成是一項可考慮的選擇。但日本國內對軍事設備需求的市場不大，企業投入生產軍事設備的資本又極龐大，除非可以出口，否則對日本國內企業而言，沒有太大的誘因。

這就會觸及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以下簡稱「三原則」）。日本雖於2011年修訂此「三原則」的部分規範，允許有些軍事設備或零組件出口，但卻留下諸多曖昧之處，引發質疑，擔心日本是否不再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國家。例如：日本允許民間企業與美國合作生產武器，而美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出口國，也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外發動最多次戰爭的國家（註20），明顯與日本的「三原則」的第三個原則：「禁止出口武器至涉入武裝衝突的國家，或是正在進行武裝衝突的過程的國家」相牴觸。還有，日本也在2009年將巡邏艇贈送給菲律賓和印尼，這樣的出口行為有否違背「三原則」？這類的問題，隨著日本與國際間軍事合作的頻率增多（註21），恐怕只會越來越多。

無獨有偶的，安倍總理在2012年表示將修改憲法，把日本自衛隊改成日本國防軍，這更增加國際間，特別是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

回顧日本的修憲歷史，除了有其重塑日本認同的考量外，一直擺盪在現實的需要與和平主義價值的堅持之間。妥協的結果，就是以解釋憲法的方式（註22），外加國會立法（註23）及修訂「三原則」的規範，來處

理自衛隊的功能與武器的使用。

事實上，小泉純一郎擔任總理的時候，自民黨已擬訂一份憲法修正草案，有人認為這份草案「象徵」（Symbolic）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為草案只是將日本已實際在運作的現況，載入憲法而已（註24）。這說明了，即使憲法真能修改成功，其內容大致跳不出目前已存在的「憲法解釋」、「國會立法」及「修訂『三原則』的規範」的框框。何況修憲的門檻很高，不易通過（註25）。

既然修憲並不容易，也會引起國際間的議論（尤其是中國），又與現況相差不大，因此，為了日本自身的國家安全，為了面對日益升高的日、中軍事緊張，我們建議：1、不推動修憲。2、以負面表列的方式，重新解釋憲法。3、廢除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第三個原則，避免曖昧不明的規範徒增困擾，而且這樣還可刺激日本的經濟成長，並降低日本的軍費負擔。

五、結語

中國在2013年11月宣布新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ADIZ），這使得日、中關係在可見的未來，幾可斷言毫無改善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勢演變下，日本一方面必須自我保護，另一方面仍須尋求多贏的策略。這個多贏的策略，是以中國「人民」及國際社會為想定的對象。

在自我保護上，日本必須毅然決然地揚棄一些不切實際的規範，讓日本的防衛能力擺脫桎梏，發揮十足的戰鬥力。此外，日本除了和美國緊密結盟之外，加大並加速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是一項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東協不論是在安全戰略上，或是能源戰略上，對日本而 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夥伴。日本必須從這樣的高度來看待東協。



日本的修憲除了有其重塑日本認同的考量外，一直擺盪在現實的需要與和平主義價值的堅持之間。

而中國在2013年11月新一代領導班子召開三中全會之後，確立了「經濟改革幅度小，政治壓迫幅度大」的國家發展方向。衡諸歷史，這種所謂的「政左經右」的發展道路，是不曾成功的。這樣的國家發展方向，只會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動盪而已。

中國已是一個國民所得六千美元的中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需求與權利意識，完全不同於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中國政府想要強行壓制民主化的呼聲，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不滿與抗爭。人民的權利意識只有逐漸甦醒，進而強化；不曾逐漸甦醒之後又消失不見的。

一個社會不安、抗爭不斷的中國，不僅不是中國人民之福，也不是日本及全世界之福。日本以設立「民主基金會」的方式，協助中國人民進行民主化的第三波改造工程，讓中國政府明白，民主的中國不但不會危害其政權，更會受到全球的尊敬，大大提升中

國的國力及國際地位。這是貨真價實的「中國夢」，是人類歷史上了不起的成就。

這個多贏的局面能否出現，現階段，有賴日本作出睿智的選擇。

六、注釋

註1：根據2012年的統計，世界前五大軍費支出國依序為：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日本。日本的軍費支出已超越法國，而這個統計尚不包括安倍總理在2013年將增加的軍費在內。

註2：請參閱 Wikipedia的“List of War Apology Statements Issued by Japan”

註3：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雖然中國辯稱是不得已才發動戰爭，但總共有：1950年的韓戰，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1969年的中俄珍寶島戰爭，1979年的中越戰爭，1996年對台灣海峽發射飛彈。

註4：例如：安倍總理在參加2013年聯合國大會前，於美國的一個智庫演說時，對他所領導的政府被指稱是軍國主義，頗表無奈與不滿。

註5：請參閱 John D. Stephe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Evelyn Huber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April）。 作者們雖提到，中產階級若與軍方合作發動政變（如：發生在拉丁美洲的案例），民主就不可能發生。但以目前中國『黨指揮軍』非常上軌道的情況來看，發生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註6：舊蘇聯的末期，生活物資短缺，人民購買食物常常要大排長龍。知識份子失業率達到50%，通貨膨脹率甚至接近100%。醫療保健不足，使得男性平均壽命，從60年代至80年代，20年間減少了5年，女性則減少了3年。

註7：參與TPP是日本很重要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也是日本對中國很重要的經濟戰略，但因其作用不只是在處理日、中之間的問題，因此，我們不在此多加論述。請參閱伊藤元重，日本經濟を創造的に破壊せよ!（ダイヤモンド社2013.3.21)

註8：林毅夫，全球經濟大衰退：超越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常態”。（FT中文網, 2012.11.02）

註9：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其國內投資金額佔該國GDP的比重，沒有像中國這麼高的。美國甚至少於30%。美國人的消費才是佔美國GDP最大比例。

註10：根據HSBC的經濟學家Qu Hongbin所做的估計，（以2003年為例），中國投入6600億美元於硬體建設上，其中約有2000億美元被認為是多餘的。而這些投資的資金，很大部分是從金



中國政府想要強行壓制民主化的呼聲，不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造成更多的不滿與抗爭。

融機構借貸而來，也就是說，是從中國人民的大量儲蓄借來的。但這些債務的數目極為驚人。累計到2009年，從中央到地方及其所屬相關單位，中國的債務高達1兆美元，約為該年中國GDP的70%。

註11：Anthony Downs借用Joseph Schumpeter所發展的“entrepreneurship”此一觀念，將其應用到政治學上，認為「政治企業家」就像商場上的企業家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一樣，會為了自己能獲得最大的權位，而福國利民。請參閱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Harper and Row, 1957）。

註12：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家戶總儲蓄，佔GDP的25%。同年美國的家戶總儲蓄，佔該國GDP僅有0.5%。

註13：Luke M. Shimek and Yi Wen, Why Do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So Much?（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2008 August）。兩位作者提到有三個原因造成中國人高儲蓄、低消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缺乏社會保障。而這個原因，也是大多數探討此一問題的專家學者所共同認定的。

註14：Thomas H. Marshall在半世紀以前，將民主社會的公民權，區分為civil、political and social rights。他說道：“social rights precursored b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請參閱Thomas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註15：近年因全球化的衝擊，北歐民主先進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受到諸多責難，社民黨甚至為此下台。但這並不表示北歐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會被取消。事實上，北歐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今仍是最被稱道的。北歐近年的發展反而說明了這些國家民主化極為深刻，從公民政治權邁入公民社會權，再邁入新一階段的調整期。請參閱Wolfgang Merkel, Alexander Petring, Christian Henkes and Christoph Eagle, Social Democracy in Power（Routledge, 2011 Feb.），以及Herbert Obinger, Peter Starke, Julia Moser, Claudia Bogedan, Edith Obinger, Gindulis and Stephan Leibfrie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Small States, Big Less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uly）

註16：「公共領域」的資訊供公眾使用，沒有授權的問題，也沒有使用次數的限制。其目的在平衡：智慧財產權擁有者的利益與社會交流所湧現的活力。智慧財產權有利於人們的創新與發明，而社會交流所湧現的活力，也是一個國家向前進步的動力，兩者必須獲得平衡，不可偏廢。

註17：請參閱Xue Li, “Energy Develoment in ASEAN Countries and Sino-ASEAN Energy Cooperation”（S. Rajarath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2009）, P.8

註18：三菱電機與IHI已有能力承造F-35戰鬥機的24項零組件，為日本省下

向美國購買F-35半數以上的經費，請參閱 Corey Wallace, Japanese Companies to Manufacture 10 % of Each of Japan's F-35As（Japan Security Watch, 2013.08.12）

註19：2010年三菱重工有關軍事設備生產的收入，只佔該公司年收入的8.7%。NEC有關軍事設備生產的收入，更只佔該公司年收入的2.8%。這表示在軍事設備這個領域，日本企業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請參閱Paul Kallender-Umezu, Japan's Export Change Won't Yield Instant Results（Defense News, 2012.01.09）

註20：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對外戰爭共有：1950年的韓戰，1964-1972的越戰，1990年的波斯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迄今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還不包括大大小小的反恐戰爭。

註21：2010年後日本與英、法的軍事合作愈趨密切。2013年6月法國總統Hollande訪問日本時，雙方協議在核能與發展軍事裝備方面，共同合作。英國首相與安倍總理在2013年的G8高峯會之前見面，双方同意共同研發軍備。

註22：1981年日本的CLB（Cabinet Legislation Bureau）對憲法作出如下的解釋：“…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as authorized under Article Nin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confined to the minimum necessary level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exceeds that limit and is not, therefore, permissible under the Constitution”。基於這樣的解釋，日本自衛隊於2003-2004年參與聯合國在伊拉克的維和任務時，不被准許使用武器。這使得日本自衛隊在前線還要受到荷蘭部隊的保護，而當其他國家派出的維和部隊受到攻擊時，日本自衛隊亦無法出手救援。為了避免再度出現類似的窘狀，安倍總理在2013年要求CLB再度集會，希望能有新的解釋出爐。而多數CLB成員在接受電視或新聞訪問時，傾向以「負面表列」的方式規範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意思就是說，除了解釋文中明訂不被允許的事項之外，自衛隊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

註23：例如，1992年允許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1999年自衛隊在區域危機出現時，可與美軍合作。

註24：Richard J. Samuels, Constitutional Revision in Japan: The Future of Article 9（Brookings, 2004.12.15）。其中第八頁，Richard J. Samuels明白表示；“Basically, it（the draft）is an honest rendering of the status quo”。

註25：修憲須經參、眾兩院議員各2/3以上的同意再經人民公投認可。這種困難使得安倍總理考慮先降低修憲門檻，再修改憲法第九條。但衡諸世界先進民主國家的修憲門檻，幾乎都是2/3，甚至是3/4，貿然降低修憲門檻，只是徒增罵名而已。

（邱義仁 / 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前總統府秘書長、前行政院副院長）

由歷史經驗看國家與社會的解構（中）

廖亮和

棄「伐謀」之上策，就下下策之「攻城」

其實，收編偽滿軍隊，抑或如郝柏村的放棄瀋陽，重兵扼守營口與葫蘆島兩個海空據點，牽制林彪四野入關，使平津走廊不受威脅的構想。

這些主張縱能實現，充其量也不過是「伐兵」或「攻城」的低階戰略目標而已，其整體效益絕對比不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的最高階攻略。特別是「伐兵」，國民黨軍隊一直無法改善「七天糧彈」後續的安全補給線問題，用武力消滅共軍，自始至終都是一廂情願的主觀期望。

就以現有的已出土史料而言，最為可行的策略，厥推魏德邁的「三國共同託管東北」方案。就單純軍事觀點而言，不但具有絕對摧毀林彪四野戰鬥力的震攝作用；在政治上，也可以解除國民黨在東北失去民心的形象，以美軍為主導的「託管」，絕對比國民黨接收大員，容易贏得人心。

共軍打贏國軍，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從兩倍到六倍的火力，才可取勝，但是國軍敗北，並非全部陣亡，而是在槍彈砲彈打完，餓著肚子，束手就擒。共軍獲勝原因，在於戰場有來自農民群眾源源不斷供應軍食，還有運輸、防禦工事的全力配合，可以持久作戰。國軍每次作戰僅有準備七天糧彈，共軍只需挺住七天不被擊潰，國軍陣地就在「彈盡援絕」下，不戰自潰，整批作戰人員被俘，美式軍械全被接收。

美國陸軍手冊開宗明義即說，美軍擁有全世界最好的補給，美軍強大戰鬥力的秘訣全在於此。是以共軍擊敗國軍，不依賴火力而靠補給的勝利因素，對美軍完全不具威脅性，何況美軍的火力也遠甚國軍，共軍可以集中優勢二十、三十倍的兵力，來達成圍殲美軍的目的嗎？戰場能有那麼大的空間嗎？

最主要的是，三國共同託管，可以透過蘇聯向中共施壓（軍事或政治）並且斷絕蘇聯明助、暗助共軍的任何企圖。1950年6月27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韓戰因應緊急會議，辯論至深夜，表決時蘇聯代表藉



「三國共同託管東北」方案，軍事上不但有摧毀林彪四野戰鬥力的作用，在政治上也可以解除國民黨在東北失去民心的形象。



共軍獲勝原因，在於戰場有來自農民群眾源源不斷供應軍食，可以持久作戰。

故不返回會場，使美國得以聯合國名義，動員會員國共同出兵，義助南韓抵抗北韓侵略。盟軍統治日本期間，代表美國的麥帥，不但禁止蘇聯紅軍登陸北海道，而且更不准蘇聯駐日代表戴里揚科（Gen. Kuzma N. Derevyanko），發表任何意見。

史達林為此怒罵，蘇聯代表直如傢俱，不能出聲。日韓同樣的情形，也會在三國共同託管的東北重演。原因無他，以蘇聯當時的國力，無法正面與美國對抗，史達林的自制力源自其自知之明。三國共同託管東北，不虞蘇聯掣肘。

林彪的四野在東北的命運，不是就地被解除武裝，不然就是師法共軍當年在華北打游擊的政策，但打游擊式的方式，能供應50萬大軍的長期給養嗎？共軍的總兵力少了林彪這支質量均優的部隊，毛澤東迅速席捲中國大陸的進程，將要遭遇多大的困難？

蔣介石不要託管，只要美軍出兵

1947年11月，蔣介石以民族尊嚴為由，斷然拒絕魏德邁的「三國託管」提議。但一個月後，英國駐日代表團團長蓋司康爵士（Sir Alvary Gascoigne）曾轉述麥帥的話，麥帥曾被徵詢做為蔣介石軍事顧問的意願，但他不作承諾，但並不反對在統治日本外，再加上一件赴華作戰的任務。他樂於帶領美國軍隊進入滿州，為國民政府對中共軍隊作戰。他誇口，在1000架合適的飛機密切支持下，他將於六個月內完成任務。他甚至同意，佔領滿州一段時間，作為中國政府的“代管人”（一如他在日本的統治地位）。

1948年6月10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



當時美國人士認為，中國已成高度集權國家，同時有不能穩定之危險，心裡存有中國或將發展成一黷武國家與帝國主義之戒懼者頗多。

登致函美國國務院，謂蔣介石願將全部權力交由美國規劃，監督並執行。同年12月10日，宋美齡代蔣介石訪美，向杜魯門總統重申三項請求，發布援華聲明，派遣美軍將領，再增軍援。

由上可知，民族尊嚴並非拒絕三國共同託管的理由，而是獅子大開口要借美軍之手，徹底消滅林彪在東北的武裝力量。1944年8月28日與9月18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要求蔣將全部中國軍隊，交由美軍的史迪威指揮，蔣以平生奇恥大辱，寧願單獨對日抗戰，也不冀求美援。當年面對外敵日寇如此大義凜然，何以時隔三年，面對國內政敵，卻不惜卑躬屈膝，一再求饒式的求救？二次大戰後，美國在亞洲出兵作戰，前有韓戰後有越戰，但是兩次均因為「日本」的安定受到威脅。前者是國防上的安全，後者是經濟上的需要。

亞洲國家對美國全球戰略上的重要性，日本取代中國的政策轉向，就在1947年開始成形，而肯楠就是關鍵人物。1947年9月，肯楠在國家戰爭學院演講：「依我們國家的安全的立場看來，“世界上只有五個工業和軍事強勢的中心”，他們是美國、大不列顛、德國和中歐，蘇聯和日本。只有這五個區域各自擁有工業潛力，足供發動今日必須的兩棲型作戰，來向美國挑戰，現在只有蘇聯是不友好的，所以未來的任務，是把蘇聯之外的歐洲和日本，保持在美國的陣營之內。」（“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War College lecture, September 17, Kennan Papers.）

中國被肯楠剔除在外，因為沒有工業基礎或攻擊性軍事力量，中國政府沒有對外製造麻煩的能力，美國所能做的，只是維持低姿態，靜待變化。

蔣介石不知已失去對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依然以當年的態度對美。1950年1月15日，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法教授，主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美國無任所大使傑賽普（Philip C. Jessup）來台訪問。次日與蔣見面，傑賽普對蔣說他不便發言，美國的意

見都已見諸前幾次的宣言。但傑賽普卻對蔣的說詞，拯救世界的唯一途徑，是由美國援助他。聽後大為反感，在其回憶錄上說，他離去時比來時，更深信這個政權應讓它崩潰。

蔣拒絕共同託管的真正原因

1944年7月21日，羅斯福總統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ie）再度來華，居里在重慶十六天，與蔣會談十四次。美方是為紓解史迪威事件齟齬的餘波。其中戰後東北如何收拾，亦為會談重心，梁敬錞著有中國東北宜為「日俄緩衝國」之謬議乙文，可為參考。

居里以美國部分人士認為，中國已成高度集權國家，同時即有不能穩定之危險，本為革命集團之國民黨，今只知保持其已得之政權，不見有前進之趨向。羅斯福總統對中國求其和平民主政體之實現，尤較促進兩國商務發達之心為切。目前美國人民心裡存有中國或將發展成一黷武國家與帝國主義之戒懼者頗多，然我人皆越切希望其不成為事實，是以華盛頓有一部人之感想，以為中國應將東北作為「戰後日俄兩國之緩衝國」。

蔣答以日本多次提出和平方案，最後退讓為中日兩國共管東北，亦遭拒絕，蓋東北為我固有領土，不可能退讓云云。

1947年魏德邁提出三國共同託管方案，觸發了蔣的疑心，認為這是三年前居里提議的「翻版」，目的在騙他上當，到時候美國藉詞拖延，拒不歸還，他豈不徒呼負負，無計可施。



魏德邁再三強調補給線之重要，但國民黨在三大戰役全軍覆亡，仍出在補給問題。

蔣的疑心，與日後國務院所發表的白皮書，有關魏德邁的報告加以對照，可以發現為蔣力保東北之苦心，從未有諸如居里提議的佈局與打算，一切都是以蔣的國軍能在東北站住腳為考慮。

「國民政府面臨中共之反對，對於佔領東北，國府毫無準備。」

「中共游擊隊與交通破壞者，實具有阻撓國軍行動，從而造成犧牲重大之長期戰爭之任務。」

「蔣委員長及其參謀人員，對於東北政府之軍隊，其合理與安全之措施，並無充分認識，尤其缺乏適當軍隊之運輸……」「在進入東北以前，必須鞏固長城以南長江以北之地區，並穩定該區內之陸上交通線。」魏德邁再三強調補給線之重要，但國軍在三大戰役全軍覆亡，仍出在補給問題。至於政治與吏治的改革，更關係到與東北唇亡齒寒的華北地區之穩定。

「應企圖佔有東北之前，集中努力，使華北之軍事與政治之形勢日臻穩固。」「應

集中其力量，以建立華北之控制，並立即實施政治及吏治之改革，以消除官吏之貪污行為，並廢除寓禁於徵之稅捐。」

有關中共之威脅性，魏較蔣有更深層的認識。「除非與中共圓滿解決……否則政府縱過數年，亦無法穩定華北局勢。」「除非與蘇聯及中共獲致圓滿解決，否則，即使經過若干年，亦無能佔領東北。」魏德邁認為解決東北問題，蘇聯乃不可或缺之角色。

「實際上蘇聯亦正為實現中共或其本身在華北及東北之計劃，製造有利於共黨之情勢。此種行動，蘇聯實違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他協定。」

這個由美國主導，拉蘇聯共同解決中共問題，由蔣介石受益的政治謀略，足以粉碎中俄兩共的陰謀與企圖。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認為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伐謀」兼具「伐交」的上兵之道。

但是蔣一心一意要消滅中共的武裝力量，自己打不過，卻偏要美軍代勞，才稱心如意。何況蔣又懷疑美方有意不將東北交給他，當然一口回絕魏德邁的共同託管之議。蔣千算萬算，沒有想到這是美方援蔣的最後一個機會，這個門關上後，就再也打不開。

中國陷阱與美國恐俄症

蔣介石所以有恃無恐，要求美軍參戰，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蘇聯可能再度恢復其在東北的勢力，威脅亞洲的和平與安定。這個「恐俄症」在美國擁有極大的票房，援蔣反共的訴求，不但有龐大的中國遊說團支持，而且在國會參眾兩院議席中，其中有不少人位居有影響力的小組重要位置。像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布里奇（Styles Bridges），溫瑞（Kenneth Wherry），諾蘭（William F. Knowland），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麥卡瑞（Pat McCarran內華達州民主黨籍參議員，非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麥卡錫），塔夫托（Robert Taft），周以德（Walter Judd），伏瑞司（John Vorys）等人，可以對美政府施壓。



蔣懷疑美方有意不將東北交給他，一口回絕共同託管之議，蔣沒有想到這是美方援助的最後一個機會，這個門關上後，就再也打不開。

蔣在1946年1月，不聽馬歇爾警告，堅信十個月就可消滅中共，並以同樣的內容告訴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馬歇爾調停國共和談失敗後，蔣立刻全面開戰，國軍能戰勝就可消滅中共。打不贏，在美國「恐俄症」的氣氛下，也可壓迫美軍出兵作戰，借美軍之力消滅中共。這是一石兩鳥之計。

但是，馬歇爾一直避免美軍直接軍事干預，深恐蘇聯也會效法，而使國共內戰因國際因素而複雜化。馬認為蔣利用「恐俄症」，



蔣介石所以有恃無恐，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蘇聯可能再度恢復在東北的勢力，威脅亞洲的和平安定，這個「恐俄症」在美國擁有極大的票房。



麥帥對台灣的態度，僅要求蔣介石來台維持秩序而已，中國要統治台灣，必須先取得主權，但台灣主權則決定於對日本和約時再行定奪。

要把美國「拖下泥淖」。從中國返回華盛頓後，馬就強烈反對任何大量援助國民黨，舉世與日俱增的需要美國援助，為何蔣的「封建法西斯政權」，享有優先權？恢復軍援，只不過加劇內戰爆發，並協助國民黨最惡劣“反動份子”維持政權而已。

不過，馬歇爾也承認，國民黨內戰失利，將有悲慘的結局，所以他勉強自己用美國的方法，協助蔣做最後的補救工作。魏德邁赴華考察，就是美方給蔣伸出最後的援手，蔣如同意改革。內戰不致惡化，美方才可斟酌狀況，給予必要的援助。

蔣斷然拒絕美方的補救方法，反而要把美國整個拖下「中國陷阱」的泥淖，美國只有袖手不管，即使蔣於1948年12月向杜魯門發出悲鳴式的求救，美方也無動於衷，任其自生自滅了！

當然，肯楠的守住太平洋與日本，就可保障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利益，中國大陸最後由共黨獲勝，也絲毫不會威脅到美國，對於當時一片「恐俄症」的美國，無疑提供了一劑有效的「解藥」，大大降低了國民黨保住中國政權，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

國府生存權，比台灣主權更重要！〈抉擇〉驅蔣與保台的兩難

麥帥為盟國最高統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天皇與政府，均聽命於麥帥，麥帥透過日本政府，有權依法處分日本所有像台灣的海外領土，當時國際間對台灣歸屬一致的共識是，應候對日和約簽訂後，因而麥帥

對台灣的態度，僅要求蔣介石來台維持秩序而已，中國要統治台灣，必須先取得主權，但台灣主權則決定於對日本和約時再行定奪。對日交戰國如同意把原屬日本的台灣交給中國，則台灣就名正言順歸還中國。否則，中國無權佔有台灣。麥帥此時所有的言論，可以證明當時中國（中華民國）對台灣並沒有統治權。

1949年1月15日，麥帥警告中共說：

「台灣，現在還不是正式的中國領土，國民黨垮台之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

1947年1月17日香港大公報東京航訊：

「麥克阿瑟認為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因此南京垮台後，中共不能進入台灣。」當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兵敗如山倒。雖然中華民國已在台灣管理一大段時間，但麥帥仍持台灣歸屬非由聯合國決定不可之立場。

1949年1月19日路透社南京電——

「鑒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美國根據開羅協定，盟軍總部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可遷廣州，不能遷都台灣」。三天後，1月22日，「合眾社」從台北發出這個電訊：

1949年1月22日合眾社台北電——

「蔣介石如果前來台灣，逃避中共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當時進行「驅蔣計畫」，美方屬意出身維吉尼亞軍校非黃埔系的將領孫立人，政治方面則圈定具有留美經歷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

長期擔任蔣介石秘書的周宏濤，在其口述的《蔣公與我》乙書，曾透露美國國務院為防台灣落入中共手中，擬要求聯合國託管。周宏濤並謂1949年11月經鄭介民求證，源自國務院遠東助理國務卿白德華及代理國務卿魏勃（Webb,JAMES）的構想，同書又附同月八日鄭介民電報，「國務院認為我必無力保持台灣，建議由我國發動交聯合國託管，保證其不變更。」「託管後我不復能用台島為反共軍事基地，職無法同意必須請示。」

蔣經國也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乙書中，引述蔣介石表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盟國管理……。」「余必死守台灣，絕不能交歸盟國。」

1949年4月23日，中共解放南京，毛澤東賦詩有謂：「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表示對國民黨斬草除根的決心，中共的三野軍團在沿海大量製造船艦，一副準備攻打台灣的前夕。台灣則大街小巷可以聽到「保衛大台灣」的軍歌，此起彼落。中共是否會攻打台灣，連國民黨自己也不懷疑。國民黨能否獨力防衛台灣，國民黨自己也不知道。

根據麥帥的說法，台灣仍在其管轄下，應該保衛台灣。但是這個主張，又與美國國務院的官方說明，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明顯矛盾。保衛台灣，是否介入中國內戰，美國國務院也不願表示。

不過有一點卻是非常明確的，國民黨不能留在台灣，仍舊進行「國共內戰」的政治或軍事活動。「託管」就是徹底的清除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台灣的勢力。

在美國人眼中，台灣人欠缺軍事與政治上，受有足夠訓練的人才，出來擔當維持防衛與政治的領導人物。因而必須由蔣介石集團中，尋找合適的足以取代蔣介石的人物。同時，為了不讓蔣介石繼續阻撓美國的政策，必須將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加以驅逐。美國人有一點態度是非常明確的，蔣介石仍在台灣發號施令，則保衛台灣就是保衛蔣介石。由此反面解釋，豈不意味只要驅逐蔣介石，就可保衛台灣？！

新任的副國務卿魯斯克，當時正積極安排並進行「驅蔣計畫」。事後出土的史料，證明美方屬意出身維吉尼亞軍校非黃埔系的將領孫立人，政治方面則圈定具有留美經歷的前上海市長吳國楨。或許美方的事機不密，或許美方低估蔣翻雲覆雨的鬥爭手腕，蔣介石表面上採取了「照單全收」的順從態度，而換取了美方仍同意保留蔣在台灣的「權位」，等到蔣成為抵制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有效障礙」，蔣立刻痛下殺手，孫吳兩人成為秋後算帳的「犧牲品」，吳被迫流放美國，孫則被幽禁三十年，下場極慘。

毛蔣爭國際地位的鬥智

1949年5月11日，蔣收到在美國的胡適代轉魏德邁的慰問信，翌日蔣回函胡適，函中特別要求阻止美國承認中共為對美工作最主要條件，周宏濤在其書中，述及年中美國即已考慮承認中共政權，周直言美國一旦承認中共政權，中共立於合法地位，中華民國即等於覆滅了。在北京的毛澤東，卻未將美方的外交承認，列為考慮選項。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主要領導人進入北京。3月25日移居香山，從當日開始，中共中央書記處五人會議，就為「國號」問題，無法取得共識。

毛主張仍用「中華民國」舊國號。「現成的，國內國外都叫順了口，習慣了，我們取代了國民黨政權，我們才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把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從國內政治、國際交往上除名。中華民國又是聯合國的五個發起國之一，中蘇美英法，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的一個，擁有議案否決權，何樂不為？」

聯合國發起國的「中華民國」，目前仍

在聯合國憲章中，並沒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中共把國民黨逐出中國大陸，只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即使世界首強的美國反對，也無法阻止中共在聯合國取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且依國際法，中共根據「國家繼承原則」，即使與美國沒有外交承認的關係，美國也無法妨礙其聯合國的權利行使。

當年中共仍沿用「中華民國」國號，蔣介石縱獲美國同意不承認中共政權，但在聯合國已取代中華民國合法地位的「中共人民政府」，一定被舉世奉為正朔，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依國際法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叛亂團體」（insurgency）或是「交戰團體」（belligerency）而已。

毛是以普世價值的「既成事實」——佔有並有效統治中國大陸全域為基礎，蔣是挾美國超強國力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理由，接受其困居台灣一隅的政權，代表不成比例也非他所控制的中國之代表權。



聯合國發起國「中華民國」目前仍在聯合國憲章中，當年中共逐出國民黨，只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即使美國反對，也無法阻止中共在聯合國取代國民黨政府的席位。

兩相比較，高下立分。雙方勝負，時間就證明了一切，蔣的堅持，仍拗不過殘酷的事實，毛所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國內與國際的「名」與「實」一切成就。

毛仍堅持用「中華民國」國號，雖然依中共黨規，少數派的主席，可以否決其他四位書記（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的反對意見，但毛為了表面和諧，顯示民主作風，乃同意廣徵外界意見，包括黨外民主人士，學者專家們的意見。結果與四位書記的意見相同，贊成仍沿用舊國號的僅有寥寥三人（廖仲愷妻何香凝女士，燕京大學雷潔瓊女教授，辛亥革命老人黃炎培），其餘一面倒的，都拒絕使用舊國號，認為形象太差，引起人民強烈反感。

毛只好自我消遣的說：

「沒想到現在是黨外人士、專家學者，辛亥革命老人們多數左傾，比共產黨人還革命，還激進。本人的右傾抵擋不住，只好服從大多數，落得皆大歡喜，一團和氣」。

中共拒用舊國號，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被拒於聯合國門外二十二年，正應了毛的預言，大家會後悔的。蔣卻繼續沿用中共所棄的國號，在聯合國屹立不動，讓中共領導精英見證了毛的戰略高度。

創造美國魔鬼，鞏固中共政權

中共解放南京城時，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預備與中共進行接觸。



毛以「既成事實」佔有並有效統治中國全域，但蔣是挾美國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理由，接受其困居台灣一隅的政權，代表不成比例也非他所控制的中國之代表權。

為此，周恩來特將燕京大學畢業的王汝梅（後改名為黃華），由天津調來南京，擔任軍管會外事處主任，以便與司徒雷登接洽，因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學校長。

根據美國的外交傳統，立即給予新政權的外交承認，而不管其是否符合正義。黃華與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接觸，司徒雷登每年6月24日，都有到北平過生日之慣例，因而他以循例要到北平過生日為由，順便拜訪中共高層，時任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也以英文信函回覆，可望獲得北平當局同意，並轉達周恩來的問候。司徒雷登決定親赴北平，探索與中共外交接觸的可能。

6月28日黃華表示北平當局同意司徒雷登訪問。兩天後，他報告國務院，沒想到卻引起國務院內部分成兩派的意見衝突，而無法定案，最後決定上呈由最高當局批示，據事後國務卿艾奇遜的說法，杜魯門深恐引起援蔣反共的右派國會議員集體反彈，激起國內爭議，最後由國務院通知司徒雷登，取消北平之行。司徒雷登只好於8月2日搭機返美，放棄他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嘗試。

司徒雷登當時曾非常清晰的明告中共，只要中共願意建交，台灣也可移交中共接收，尤其國共內戰勝負結果明朗後，美方即對中共刻意保持友好氣氛，深恐有礙兩方建交的進行。當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毛澤東又高喊「血洗台灣」，民主黨的杜魯門反而撇清責任，發表了千頁的白皮書，徹底與國民黨劃分界線，極度明確的向中共表示交好，並且發表決定坐視台灣落入中共手中，也不願對蔣伸出援手，深恐觸及毛澤東的逆鱗，妨礙與中共新政權建交的和諧。

當年6月30日，毛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乙文，明確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縱然司徒雷登當時如願來到北平，也改變不了中共「一面倒」的外交政策。

1950年1月1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提案「取消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在安理會席位」，被六票對三票否決，次日聶榮臻（十大元帥排名第九），即派員強佔美國在北京的領事館。並在三月總領事克羅勃離華時加以留難。

瀋陽總領事華德也被拘禁。同年2月14日，中俄兩共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6月25日韓戰爆發，10月19日由彭德懷率幾十萬大軍過鴨綠江，中共正式出兵「抗美援朝」。

經歷了這三個事件，美國自此才放棄與中共建交的想法。

曾經在鮮明主張兩岸統一的媒體上，看到批評聶榮臻的暴行，實在不智，阻礙了與美方的外交關係。

其實，這是皮相的看法，上述作法均經毛深思所做的決定。毛由蔣被史達林「始亂終棄」的過程，發現史一直顧忌中國與美國和睦結盟，所以終史在生之日，毛一直提高警覺，不敢表露任何有意與美方接近的意圖。由毛的家庭醫師李志綏的回憶錄，均可以感受到毛喜愛美國文化，遠甚於俄羅斯文化。

再者，中共打敗國民黨不久，還沒有實力掌握整個江山，如果跟美國建交，以國民黨與美方的深厚交情，趁機滲透進行分化，將會給他坐天下的安全帶來不測，所以他對美國乃以拒絕來保持距離，使史達林放心，不會對他作出任何不利的反應。

出兵打韓戰，是因為國民黨的降兵降將，總數有807萬之多，比解放軍的總兵力



中共打敗國民黨不久，還沒有實力掌握整個江山，惟恐受到滲透分化，所以對美國乃以拒絕來保持距離，使史達林放心，不會對他作出任何不利的反應。

還多出一倍，這個政權的不定時炸彈，只有將他移到國外，利用韓戰去消化。

鞏固國民的團結，中外皆無例外，都要製造一個「共同的魔鬼」，中國歷來的世仇就是日本與俄羅斯，日本已經投降戰敗了，把日本列為魔鬼，這個過時的敵人，激不起人民的熱情。俄羅斯是中國百年世仇，但現在沒有能力向他挑戰，算來算去只有長期幫助國民黨的美國，是最理想的「魔鬼」，可以把中國人民痛恨國民黨的憤怒情緒，引燃到美國身上，長期保持國民對中共政府的向心力。

中共的領導人，與國民黨鬥爭廿二年才取得勝利，期間所受的折磨與痛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這並非表示中共的領導人其意志比別人堅強。而是他們均有其基本信仰，透過歷史的辯證，只要認為正確的方向，即使目前存有多大困難，堅持長期努力，目的就會達成，他們推翻國民黨，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中越發生戰爭時，鄧小平說給越南一



鞏固國民的團結，都要製造一個「共同的魔鬼」，長期幫助國民黨的美國，是最理想的對象，可以把人民痛恨國民黨的情緒，引燃到美國身上，保持對中共的向心力。

些教訓，十年後再把他們拉回來。這樣的信念，也同樣適用毛澤東，當年國共內戰勝利，中共客觀條件並不能傾向美國，所以他寧願等幾十年後，再把美國人拉回來，事實上，不到二十五年這個目的就實現了。

杜魯門重估蔣介石的利用價值

眾所週知，韓戰的爆發，解救了蔣介石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並限制雙方互相攻擊。

韓戰爆發前一個月，蔣介石曾給杜魯門一封「密函」，如果美方願意改變放棄台灣的政策，他願意退出目前的地位。杜魯門在6月26日，當著國家安全會議上宣佈此事。此信目前仍載於國務院正式記錄，中華民國是否擁有台灣主權，此信提供了最為直接的歷史證據。

杜魯門也同時表示，台灣未來的地位之決定，必須待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於日本和約簽訂，或由聯合國來考慮。



韓戰爆發，蔣介石認為是反攻大陸的大好機會，可以利用美軍之力，經由北韓進入中國東北。

韓戰爆發，美方的文官與武官有明顯的對立意見。

武官們，包括麥克阿瑟在內，他們認為失去中國後，拯救南韓已無甚意義，戰爭發生時，他立刻發令以運輸能力和空軍支援南韓，對於建議使用地面部隊卻有所猶豫。一般將領認為中共政權成立，保持南韓實屬浪費寶貴國防資源。

文官們，如國卿艾奇遜與其顧問，認為北韓是蘇聯的傀儡，應對其向南韓的攻擊有所反應。南韓已被納入杜魯門主義的保護傘下，既然北韓共黨越過“國際防線”實際進攻，等於向聯合國挑戰，試驗美國的可靠性，也是蘇聯試探西方國家的決心。因此，南韓戰略價值上的任何考慮，或李承晚政府是否腐敗破爛，都顯得不重要。

南韓戰略價值不高，美方都決定出兵保護，那麼比南韓戰略價值更高的台灣，被棄而不顧，豈不暴露自我理論的矛盾。

美國軍方也一直要求白宮與國務院，再度審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艾奇遜也同意軍方的主張，但卻對防止台灣被中共佔領，與挽救蔣介石政府，應徹底分開。他尤其不希望韓戰因而挽救被美方所輕視的蔣政權。

他的台灣政策是，保衛台灣不被佔領，脫離中國大陸控制，暫時置於美國或聯合國保護下，事後由本地人所成立的政府治理。

韓戰爆發，蔣介石認為是反攻大陸的大好機會，可以利用美軍之力，經由北韓進入中國東北。蔣願意提供最精銳內戰整軍倖存的第52軍（原軍長劉玉章）的兵力作戰，

杜魯門猶豫不決。艾奇遜立刻分析利害，加以阻止。並且深恐麥克阿瑟受蔣所惑，也由杜魯門派前蘇聯大使哈里曼，前往東京力勸麥帥打消接受蔣派軍參戰之議。1950年9月13日，馬歇爾接替辭職的詹森（Louis A. Johnson）繼任國防部長，周宏濤與蔣介石等咸認為是為了節制麥克阿瑟，因麥帥與國務院對台政策完全不同，周書記載美方不久就傳出杜與馬協商要調動麥帥。

當時美國正準備結束佔領日本，與日本簽定和約，但是有關結束佔領後，日本是否仍提供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國務院與軍方還有盟軍司令官麥克阿瑟，三方各持己見，鬧得不可開交。

軍方反對任何和約，主張無限期軍事佔領，俾能長期使用日本軍事基地；麥帥主張「永久非武裝」「中立」；國務院則介於折衷。

韓戰發生，三方的爭執都就此化解，各方捐棄己見，綜合各方的堅持重點，納為對日和約的一部份，美方與盟國同日本簽定和約後，另外訂立「日美安保條約」，允許美方永久使用日本軍事基地，日本成為「半獨立」的國家，但總算結束美方的佔領。

美軍結束佔領日本後，由日本經琉球，到菲律賓，這條第一島嶼鍊，不能獨缺台灣這個缺口，美方把台灣納入共同防衛體系內，台灣被提升為美方事實上的盟國，並成為美軍太平洋防衛線的支柱。

國共由於台灣海峽的隔離，本可宣告內戰結束，卻由於美方支持國民政府繼續擔任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使內戰繼續延長下去，台灣長期依賴美國的保護，更使美方成為台島主權的實際公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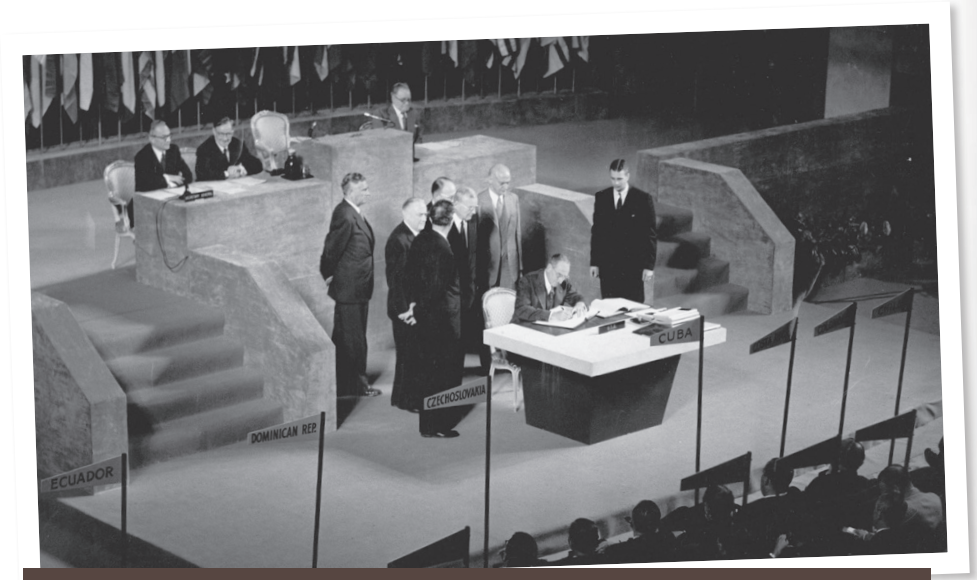
國共由於台灣海峽的隔離，本可宣告內戰結束，卻由於美方支持國民政府繼續擔任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而使內戰繼續延長下去。

由於這個被利用的價值，國府成了美方抵制中共進入聯合國的「絆馬索」。韓戰末期，美方要求中共停戰，若不答應，美方考慮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則又成了嚇人的「鬼面具」。

位於外國土地上的流亡政府

1955年2月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秘密聽證備詢，當天主題為「中（華民國）美協防條約」。

杜勒斯答覆傅爾布萊特與史巴克曼的質疑，曾告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僅為佔領當局（OCCUPYING POWER），其地位與美軍在琉球與巴拿馬區一般，並謂條約中的雙方「領土」慎選使用terriorie一詞，並未意含主權（sovereignty）。台灣群島與美軍西太平洋島嶼雖同列為「領土」，但雙方仍屬「佔領當局」而已。



舊金山和約由日本與48個交戰國締約，由於英國堅持要由中共代表中國簽約，與美國發生爭執，最後協商結果，決定不邀請海峽兩邊任何一方參加。

有關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杜勒斯回答摩斯參議員，中華民國雖享有美國法律之承認，但理論上仍是一個位於「外國土地」（alien land）上的「流亡政府」（government exile）。

杜勒斯國務卿在杜魯門時代，擔任國務院的最高級顧問，盟國對日本和平條約（舊金山和約）即由其主導與起草，可說由其解釋舊金山和約，最具權威性的代表。

中華民國在舊金山和約「同意紀錄」放棄台澎主權

舊金山和約第2條第（b）項規定：

「日本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原和請求權。」

中華民國主張當時佔有台灣，所以日本放棄，當然是由中華民國繼承。由外表觀察這似乎言之成理，但外交文件上則不是這麼一回事。

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8日，在美國戰爭紀念歌劇院（War Memorial Opera House），由日本與48個交戰國正式締約。由於英國曾堅持要由中共代表中國簽約，與美國發生嚴重爭執，最後在杜勒斯親赴倫敦協商結果，決定不邀請海峽兩邊任何一方之中國參加，將來由日本單獨選擇兩者之一締結和約。

中華民國不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約締結，但卻是台澎群島的實質占領者，有關舊金山和約中規定的台澎主權，關係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利益至關重大，如果中華民國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主場，在聯合國杯葛舊金山和約，美國將會增加許多難以克服的外交與防共的難題。因而美方要求中華民國以正式外交文件，確保舊金山和約締結後，絕對信守承諾，以杜後患。

於是由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代表蔣介石，於1950年12月12日致函美方舊金山和約主導人杜勒斯，表明：「對日和約，只要求日本根據波茨坦宣言所訂投降條件，宣布放棄對有關領土的所有主權即為己足，不要求日本將這些領土交給任何國家」。



日本放棄台澎群島的主權，並沒有明言交給任何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只是受舊金山和約第23條規定「日本主要佔領權的美國，其所委任的次要佔領權國」而已。

美方於1951年3月19日，依外交慣例覆函顧維鈞表示同意，雙方並完成「同意紀錄」之換文協議。這個外交文件，國際法稱之為和約簽署前之「同意紀錄」，係屬條約的一種。由於非屬正式外交條約，「同意紀錄」不一定要由國會批准，但是附於「和約」之「同意紀錄」，如「條約」已正式生效，則其效力及於「同意紀錄」，「同意紀錄」其效力與「和約」本身相當。

中華民國並非舊金山和約簽字國，本不受「和約」效力所拘束，惟舊金山和約既由日本與其他48個國家共同簽署，則中華民國附於舊金山和約的「同意紀錄」，自當對其與美方換文簽署之「同意紀錄」負責，同時受「和約」與「同意紀錄」之效力所約束，自不待言。

日本放棄台澎群島所有的主權，並沒有明言交給任何國家。

中華民國雖佔有台澎群島，但並不主張擁有主權，而且出於主動放棄，其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只是受舊金山和約第23條明文規定「日本主要佔領權的美國，其所委任的次要佔領權國」而已，也就是杜勒斯在參議院所說的「佔領當局」而已。

同意紀錄之國際威力與毀滅國內政權之實例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法國巴黎所舉行的和會，討論德國敗戰後其在中國山東的利權問題，日方代表西園寺公望要求繼承德國權利，並於4月22日正式聲明，非依本國訓令，使問題解決後，方得於和約簽字。

中國代表陸徵祥於次日提出四項修改方案，但不為日方所接受，於28日另提代替方案六項。日方並揭舉民國7年（1918），濟順，高徐兩鐵路借款合同未簽訂前，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曾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於1918年9月24日，臚列中日合辦經營膠濟路及聘請日人訓練警察等六項，在同意紀錄之換文，內謂「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右列提議，欣然表示同意。」復舉陸徵祥更於赴巴黎途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政府代表，台灣如由日本手中轉交給中華民國，根據國家繼承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依國際法有權主張台灣應歸屬其所有。

經日本時，曾承諾在和會中與日方合作，不單獨提出議案云云。

英美法三國代表根據國際法「同意紀錄」，等於和約之效力，而且日方已聲明將膠澳地方連同主權完全交還中國，中國並無多大損失。故巴黎和會最後決議，允將戰前德國在膠州及山東所有各種權利讓渡日本。中國代表於5月1日提出嚴重抗議，英美法三國代表毫無表示，交涉遂告完全失敗。

由於徐世昌的北京政府，深恐違反國際法規定，慘遭到列強制裁，不顧五四運動所引起的全國怒潮，仍堅持簽字為宜。學運拒絕同意，「官意」與「民意」尖銳對立，北京政府雖沒有遭到列強報復，但又無法平息全國怒潮，只好集體下台，向民意低頭，也向列強謝罪。

蔣介石放棄台灣主權，換取在台生存機會

杜勒斯其外祖父霍士特（John W. Foster），曾任美國務卿，也曾在中國駐美公使館充任法律顧問，更與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駐美公使期間成莫逆之交，1895年的馬關條約即出自其手。杜勒斯秉承外交的家學淵源，舊金山和約內容即由其一手主導。

蔣介石所以授權顧維鈞簽署「同意紀錄」，即是美方杜勒斯曉諭利害，分析中華民國堅持主張擁有台澎群島，將會遭遇到難以意料的「災難性後果」，中華民國已喪失中國大陸全域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台灣如由日本手中轉交給中華民國，根據國家繼承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依國際法規定，有權主張台灣應歸屬其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奪取台灣主權，勢必引爆國際間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說法，實際很難說服並讓大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美國第七艦隊亦不可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有的台灣海峽活動。美國杜勒斯回覆中華民國的質疑，即明白表示凍結台灣地位，實際即是維護國民政府的地位。中華民國如在聯大會議反對美國立場，勢必增加美國意欲確保台

灣不為中共所奪及維護中國（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等方面的困難。

中華民國不接受美國「凍結台灣地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第七艦隊保護台灣，立刻喪失法理依據。但是接受，等於自己承認非法佔有台灣。兩害相權，中華民國只好捨「合法」而選擇非法，生存大於一切，便顧不了非法。

正因為國民政府有此深切的瞭解，洞明個中利害關係，嗣後乃有1950年12月19日，由駐美大使顧維鈞照會美國舊金山和約主導人杜勒斯，並於後所簽署的「同意紀錄」之協議。

從琉球歸還找答案

舊金山和約第4條第（b）項規定：

「日本同意美國軍事政府或依其指示於第2條（台澎群島）與第5條（北緯29度以南之琉球群島乃大東群島，孀婦岩以南之小笠原群島西之島及硫磺列島）所載之任何區域內，所進行之日本財產乃國民的處分，皆具效力。」其末段有載明「送交聯合國之信託統治制度提議。在此提案獲得通過之前，美國對上述地區，所屬居民與所屬海域得擁有實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權利。」

再依同法第23條規定，日本主要佔領權為美國。實質佔領的中華民國既非舊金山和約之簽字國，當然是屬於「次要佔領權」。

舊金山和約第3條所載的琉球群島等島，1960年（昭和35年）日本成立了「沖繩縣回歸祖國協議會」。小笠原群島於1968年歸還日本，1969年佐藤首相訪美，而使1972年5月實施沖繩歸還日本。



琉球是美軍從日本手中加以佔領的，歸還日本自無疑義。台灣則是日本放棄的，變成無主可歸還，這是台灣與琉球最大的不同。

台灣與琉球群島既同被列為美國軍事政府可以任意處分國民與財產之效力，並且具有行政、立法、司法之全面權利。沖繩歸還既有成例在先，台灣亦唯有從琉球歸還案中，找出解答。

琉球是美軍從日本手中加以佔領的，歸還日本自無疑義。台灣則是日本放棄的，台灣則變成無主可歸還，這是台灣與琉球最大的不同。

根據美國憲法第1條第8項規定，美國對佔領地，其防衛費用，統由美國負擔。台灣、澎湖群島與琉球群島，皆為美軍依舊金山和約所明定的佔領地，其防衛費用本就不應由被佔領地負擔。琉球無此爭議問題存在，但台灣向美國購買武器，卻要支付龐大天文數字的費用，這已明顯違反美國憲法的規定。

再查，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其第5條（a）項：「為促進本法第二條所規定之政策，美國將提供台灣，其足以

維持充分自衛能力所需的的防衛性物資及防衛性服務。」

該條明文為「提供」，但中華民國則公開宣稱為「軍售」，明確表示要付費。似此與美方所宣布的法律，截然不同的中華民國政策，內中已隱藏有許多不足以為外人道的秘密存在。

日本本土當年也是被美國佔領，初期美國還為日本的財政赤字缺口，提供不少援助，即以1947年，美國就供應了20億美金資助日本度過難關。

美國的國家正如其國旗的星星一樣，是不斷的擴張改變，由建國的初期，擴張到今日的十倍疆域。美國對擴張領土，比其他國家更有豐富的經驗，其中不少是經佔領或割讓而獲得。由於這個獨特的豐富經驗，美國獨自發展了獨樹一幟的「佔領」與「戰爭」的整套法律規範，並進而成為國際法的一部份。

對於被舊金山和約載明為「美國佔領地」的台灣，有一點是大眾共同關心的，佔領者能否對被佔領地的人民，施行主權國家才能具有的權利——「徵稅」與「徵兵」？

答案非常簡單，不行！絕對不行。因為這是國際公法的禁制規定。

二次大戰，日本佔領大部分中國土地，納粹德國佔領法國，這兩個侵略國家，他們都沒有向被佔領地的人民，直接實施「徵兵」與「徵稅」的權利。而必須透過由當地本國人民所組成的，一般稱之「傀儡政府」為之，而不敢逕行公開掠奪強徵，因為這明顯違反



美國對領土擴張，比其他國家更有豐富的經驗，因此發展了獨樹一幟的「佔領」與「戰爭」法律規範，並進而成為國際法的一部份。(圖為美西戰爭中的美軍)

戰時的國際公法之規定。

尤其是，前文述及，蔣介石集團為了托庇於美國的保護傘下，自己主動表明放棄台澎群島的領地與主權，並將其與美方換文的「同意紀錄」，附列於舊金山和約之後。舊金山和約於1951年9月28日簽署，其效力及於放棄台澎主權的日本，日本從此不能對此有所權利主張，何以也同時主動放棄上開權利的中華民國，竟然仍在台澎群島享有主權國家的權利！？進而擴張為殖民統治？

國際間為何縱容此種違反國際條約的情形存在？！

被中華民國無權統治的台灣人民，為何沒有一點反對的意思表示？！

（下期待續）

（廖亮和／台大商學系畢，早年師從邱永漢先生，長期經營廣告與促銷業務。黨外雜誌蓬勃發展期，陸續介紹美式競選廣告及為文評論財經事件，作品散見財訊、商業周刊、時報周刊及多家報紙，近年著重歷史研究，本文為以解構主義試圖解讀現代史的研究成果）

會務紀要

秘書處

推動台灣二次民主改革『民主講堂』巡迴演講活動

近年來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台灣的政治軸線再度翻轉，顯示人民對社會正義的渴望，以及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回顧過往，第一次民主改革已成為台灣人的光榮與驕傲，但是進入21世紀後，面對代議政治的失靈、經濟環境的惡化與分配正義的未落實，多數人並沒有因為時代進步而更加安定與快樂；有鑑於此，李前總統大聲呼籲推動「第二次民主改革」，包括區域均衡發展、資源公平分配，把權力還諸於人民，以補足第一次民主改革的不足。

本會秉持李前總統的政治理念，從今年6月開始，啟動「民主講堂」巡迴列車，由李登輝民主協會新北市分會負責執行，自新北市三重區起跑，已於各區進行多場演講，希望藉由本次活動促進台灣社會更加了解二次民主改革的重要性，提昇國人對落實地方民主、促成憲政體制改革決心、強化台灣意識觀念，並激發國人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與熱情。歡迎關心台灣未來的朋友踴躍參加，詳細資訊請參考下列資料，或洽新北市分會02-2987-8058。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承辦單位：李登輝民主協會新北市分會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5年11月

活動資訊：www.lthsociety.org/schedule.pdf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訪問日本 接受日本放送協會(NHK)專訪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7月下旬訪問日本，並受邀至日本國會眾議員會館演講，隨後至日本東北地區慰問海嘯災民。此次訪問行程中，李前總統特別接受日本放送協會(NHK)獨家專訪，暢談對於台日經濟合作的建言，並表示支持日本的新安保法案。

李前總統在專訪中，首先呼籲台日之間的經濟合作，活用網路商機，讓雙方都從中獲利；此外，也針對日本經濟提出個人建言，指出安倍經濟學現今會成為大問題，就是因為經濟沒有成長，要提升日本經濟就需要技術革新；而針對日本的新安保法案，李前總統也表示支持的立場，面對中國解放軍在南海與東海等多處地區，對外積極擴張持有領土，對鄰國造成高度緊張的態勢，為此日本不能只依賴美國幫助，要有自己的路線。

此次專訪由NHK主播鎌倉千秋女士進行訪問，鎌倉千秋女士也是本會常務理事許龍俊先生的外甥女，兩人在日本相遇之餘，也為嚴肅的訪問帶來一絲輕鬆氣氛。

日本自民黨青年局訪台
李雪峰常務理事受邀演講

日本自民黨青年局由代理局長牧原秀樹眾議員於8月中旬率團訪台。青年局有自民黨培育政治家的搖籃之稱，許多幹部日後在日本政界嶄露頭角，多位日本首相早年均曾擔任青年局長一職，自1965年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擔任局長以來，即定期由該局局長率團訪台，與台灣淵源深厚，是自民黨與台灣交流的重要窗口，故此次訪台也特別受到矚目，行程中拜會台灣各界朝野政要。

本會常務理事李雪峰先生於19日受自民黨青年局之邀，於國賓大飯店進行演講，講述高座會串連起台日交流的歷史緣由。李雪峰常務理事亦是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理事長，該會是由日治時期前往日本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工作，製造戰鬥機的台灣少年工所組成的交流組織，多年來在維繫兩國民間友誼上功不可沒。李雪峰常務理事講述台灣少年工造飛機的故事，克服戰時困乏的環境，戰後歷經艱難終於返回台灣，有感台日間的珍貴情誼得來不易，期盼青年局的年輕幹部們能努力延續，扮演兩國友好的橋樑。





DEMOCRATIC VISIONS 民主視野

需要您的支持

親愛的讀者：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長期致力於深化台灣民主，關心國家前途與發展。為了落實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理想，促進社會理性對話並影響政府決策，我們用心編輯出版《民主視野》，提出前瞻性思維、監督政府施政，期使台灣能逐漸蛻變成長為一個具備優質民主內涵，社會進步繁榮的國家。

然而，時下的媒體文化，往往追求一時的感官刺激，雖滿足了「知」的需求，卻無法針對議題深入探討，無法承擔思想啟蒙的任務。我們期待《民主視野》能在公共政策上，扮演社會國家的智庫，以客觀的觀察、學理的分析，提出全面周延並且可行的政策建議，對公民社會與政府官方產生影響力。

我們的力量來自於您的支持，我們深知經營媒體不易，但我們仍願意勇往直前。在努力的過程中，您的鼓勵是我們讓《民主視野》繼續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深耕民主的動力。我們希望您使用所附的郵政劃撥單，訂閱《民主視野》或是贊助出版經費。《民主視野》

祝您

闔家平安　萬事如意

編輯委員會　敬啟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記錄

經辦局收款戳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收款帳號 5015373 2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金額（阿拉伯數字）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收款戶名 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寄款人

姓名

地址 □□□－□□

電話

經辦局收款戳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 訂閱一年4期，500元
□ 訂閱二年8期，1,000元

□ 贊助一年4期，1,000元
□ 贊助一年4期，2,000元

DEMOCRATIC VISIONS 民主視野 稿約

本刊秉承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理念，以深化台灣民主、拓展國際外交、強化國家主體意識為宗旨，針對各項國內議題、國際動態，提出前瞻性觀點，以增進國家整體利益，並促進台灣進步發展。

本刊歡迎各界投稿，就政治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社會安全、人權法治、永續環保或其他國內外重要議題，提出時事評論、政策藍圖或學說思想。

稿件不接受以相同之內容、形式或語言發表或刊載於國內外其他刊物、平面媒體、網站或部落格等的文章。時事評論約1,500字，政策藍圖約3,000字、學說思想約5,000字為原則。歡迎同時提供與內容相關，未有版權爭議之照片或圖片（JPG或PNG格式）。

投稿文章以漢文（正體字）為主，若為英文或日文，請事先洽詢本刊編輯部。撰寫年代以公元格式為原則；文字建議以標楷體或新細明體、英文字以Times New Roman撰稿，並以Word格式編排為電子檔。作者以真實姓名發表為原則，需註明一個主要頭銜或職務，並附上連絡電話、信箱及通訊地址。

本刊預定每年出版四期，截稿時間為出版前一個月。稿件敬請傳送至李登輝民主協會（leedemocracy@gmail.com）。本刊保留刪改權，若不採用恕不另行通知，敬請作者自留原稿；經刊登之圖文，本會保有以不同形式再出刊之權力；作者如有自行集結出版，亦請註明出處。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注意事項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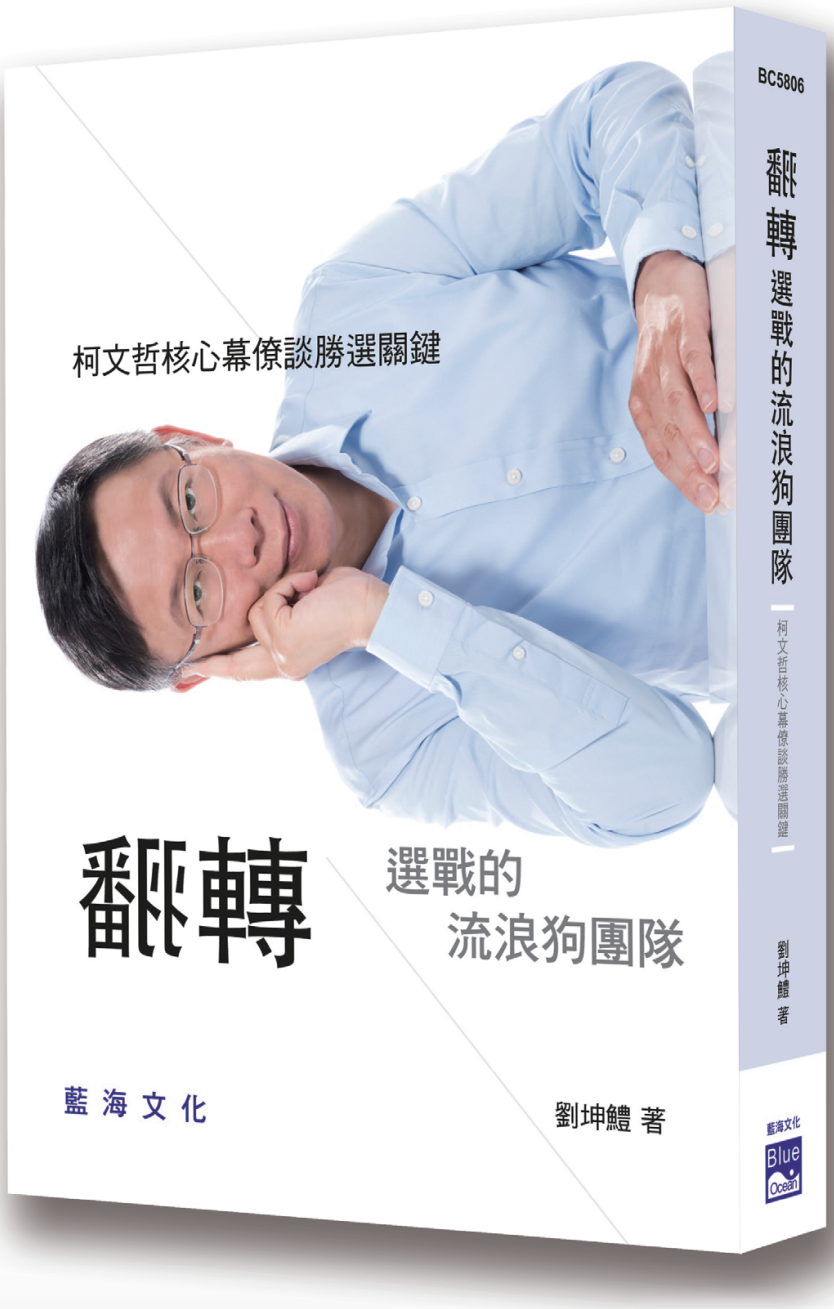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按權由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交易代號：0501、0502 現金存款　0503 票據存款　2212 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本書是筆者在柯P勝選後，訪問了19位柯P競選團隊的核心幕僚，請他（她）們以「口述歷史」方式現身說法，從自己的參與過程提出柯P勝選關鍵的解釋的彙整；再加上筆者親身參與並負責執行「監票部隊」任務的心得，並且把這次幫柯P助選的經驗拿來跟過去多年助選的經驗做比較，從「全局圖像」的角度，針對「台灣共識」、「新興媒體與新政治」、「柯P現象」和「改寫歷史的監票部隊」等主題進行解密，跟讀者們分享柯P勝選的關鍵。

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藍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Blue Ocean Educational Service INC
http://www.liwen.com.tw/
訂購請洽：(07) 07-2236780分機 236



李登輝民主協會http://www.lthsociety.org
劃撥帳號50153732　戶名：社團法人李登輝民主協會
地址：251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1號30樓
電話：02-2808-0595　傳真：02-2808-0596
Email：leedemocracy@gmail.com